

2023年國際經濟與金融趨勢論壇專題演講

全球化最新發展 與 台灣因應之道



中央銀行
楊金龍

2023.7.29



近年來，關於**全球化(globalization)**議題的討論不斷，若干論者認為，目前已走向**逆全球化(deglobalization)**，有論者甚至宣告**全球化已死**，全球經濟正朝**兩極化、多極化**，甚至**零碎化(fragmentation)**發展；惟亦有人認為，**全球化仍持續進行**，但須重新定義其內涵。

全球化乙詞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(IMF)的定義，係指透過商品、服務及資金的**跨境流動**，導致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的過程，為人類創新及技術進步的結果，有時亦包括人員(勞動力)及知識(技術)的跨境流動，以及更廣泛的文化、政治及環境方面的交互影響。

1989年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提出「**華盛頓共識**」(Washington Consensus)，強調總體經濟紀律、市場經濟及對全球開放。「**華盛頓共識**」基於自由市場(free market)的原則，倡議**民營化(privatization)**、**利率自由化(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)**及**貿易自由化(trade liberalization)**等政策，亦可稱為**新自由主義(neoliberalism)**。自1990年代以來，受「**華盛頓共識**」影響，開發中經濟體與轉型期經濟體逐步開放市場、擁抱全球化，**促成了全球化的蓬勃發展**。

歷經**1990年代全球化的快速發展**，帶來全球高度經濟整合及跨國產業專業分工，有助於**全球所得增加、整體生產力提升、貧窮率降低、通膨走緩**；不過，全球化亦帶來**先進經濟體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**、許多國家面臨**貧富差距擴大**等問題，從而引起對全球化的不滿與反對聲浪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**Dani Rodrik**早於1997年即示警：自由貿易的**總體面經濟效益雖顯而易見**，**但個體面卻不是如此**；若無法落實所得重分配，經濟學家所聲稱的全球化好處，與非經濟學家

的實際感受，將產生巨大的落差；自由貿易會使獲益民眾與受損民眾對立，後者將抵制全球化，從而引發民粹主義(populism)。

Rodrik亦曾提出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困境(trilemma)。全球化迄今的發展，似印證了Rodrik的預言，各國逐漸走向保護主義(Protectionism)。例如中國大陸歷經過去的改革開放後，近年業已調整其經濟發展路線；為防止民營企業及資本主義(capitalism)在全球化發展中過度壯大，以致對既有體制形成挑戰，中國大陸一度轉向「國進民退」，並加強產業監管(例如要求對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進行整頓改革)。至於過去如美國等曾長期擁護自由貿易的國家，已漸朝向重視國內產業政策的方向邁進；本(2023)年4月以來，美國政府更提出「新華盛頓共識」(new Washington Consensus)，強調去風險化(de-risking)、政府政策介入的概念，凸顯對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反思。

一般認為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，全球化已減速，加上近年美中爭端、COVID-19疫情及俄烏戰爭，更使安全與韌性(resilience)備受重視，主要國家推動供應鏈在地化、區域化及多元化發展，重新調整全球化腳步，導致全球化進一步放緩，並重塑各國貿易及投資結構，形成內涵有所轉變的新全球化(newbalization)。

今天，我將簡述全球化發展進程與反思；再說明我國廠商因應變局的全球生產布局與相關資金流向之變化，以及我國銀行隨台商調整供應鏈布局，增加相關存、放款業務、擴充海外據點以擴大經濟腹地來提高營運能量；最後再作一總結，並提出在全球經貿新變局下宜持續關注的議題，供各位先進參考。



大綱

一、全球化發展進程與反思

- (一) 全球化發展進程：全球金融危機前達高峰，近來已放緩
- (二) 全球化發展的效益
- (三) 全球化發展產生的衝擊與反思

二、全球金融危機後，全球化減速，重塑各國貿易及投資結構

- (一) 全球供應鏈分流、朝在地化發展，對外直接投資趨於零碎化
- (二) 伴隨全球供應鏈重組，美國與中國大陸彼此的貿易依賴程度下降，對東協的貿易往來則升溫

三、我國廠商因應變局，多元生產布局，強化供應鏈韌性

- (一) 順應供應鏈重組，台廠進行全球產能調整，擴大在台及東協產能，在中國大陸產能則增加供應當地內需比重
- (二) 隨著半導體成為戰略物資，美、日、歐等主要國家拉攏台廠前往設廠；台灣半導體大廠多元布局，降低國際客戶對供應鏈中斷風險的疑慮

四、隨我國廠商多元布局，其對外直接投資與三角貿易跨境資金的地區別流向也出現變化

- (一) 隨台廠增加對東協與美國投資、減少對中國大陸投資，國人對東協與美國之直接投資淨匯出比重增加，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淨匯出比重則減少
- (二) 隨台廠擴大東協產能，國人對東協與新加坡之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增加

大綱 (續)

五、隨台商擴大東協布局，我國銀行與東協國家之資金往來更密切

- (一) 隨台商增加在東協布局，國內銀行對東協地區客戶的放款及存款比重均明顯成長，反映其提供資金協助台商海外投資營運
- (二) 本國銀行隨台商增加東協分支機構據點，擴大經濟腹地，提高營運量能與獲利

六、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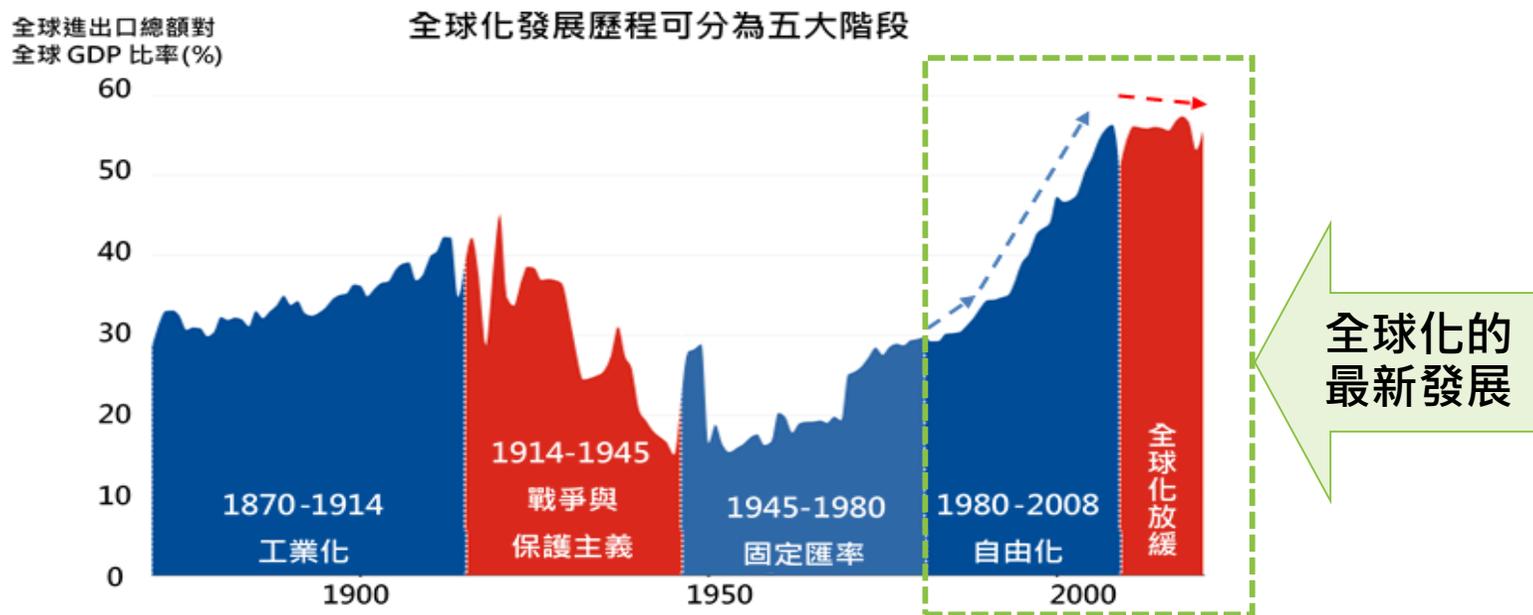
- (一) 主流經濟學觀點偏重全球化帶來互利互惠的總體面經濟效益，卻忽略全球化有贏家、亦有輸家的個體面分配不均問題，亦忽略全球化恐限縮國家政策空間，可能引發政經不穩定。全球化宜為有限度、有智慧的全球化；為避免形成超全球化並緩和全球化造成之外部性和逐底競爭問題，主要經濟體宜透過國際政策協調來制定全球化之基本規範
- (二) 在地緣政治風險及全球供應鏈重組變局下，為我國企業帶來新發展機會，其以投資與貿易地區分流因應，不但提升台灣的生產韌性，並使台灣的經貿發展更趨平衡；惟企業也面臨諸多挑戰。企業亟需妥適應變，並搭配政府政策的支持與協助，讓台灣繼續保持競爭優勢，確立不可取代的地位
- (三) 金融業順應供應鏈重組及多元布局，擴大經濟腹地規模，並協助台商籌資，增進金融服務量能
- (四) 美中爭端使台灣對美國貿易順差擴大，宜持續關注其發展，並避免成為美國貿易制裁對象

一、全球化發展進程與反思

(一)全球化發展進程：全球金融危機前達高峰，近來已放緩

1. 1990年代~2008年間，全球化快速發展

- (1)1980年代全球化開始盛行，1990年前後，國際間重大事件發展的結合(中國大陸改革開放；柏林圍牆倒塌、蘇聯瓦解等)，造就全球化快速發展。
- (2)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，受惠於科技進步、運輸成本下降及貿易壁壘逐漸消除，以及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WTO成為全球生產基地等，全球化蓬勃發展，全球貿易對GDP比率快速上升。



資料來源：Stanley, Andrew (2023), "Globalization's Peak," *IMF Finance & Development*, Jun.

2.全球金融危機後，保護主義日漸興起，迨至近期，全球化速度已放緩

- (1)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，全球經濟成長走緩*，保護主義抬頭**，加以中國大陸在內外部壓力下***推動經濟「再平衡」(rebalance)結構改革及「中國製造2025」，提高自給率；另美國亦因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、對中國大陸貿易逆差龐大等，推動製造業回流與採取貿易保護措施，全球化腳步趨緩。
- (2)2018年起，美中貿易爭端不休，加以COVID-19疫情、供應鏈瓶頸，凸顯核心生產基地過度集中之脆弱性；尤其2022年爆發俄烏戰爭，持續推升地緣政治風險；各國政府積極藉政策引導及產業聯盟，使世界經濟逐漸朝向供應鏈分流、在地化與區域化發展，以提高韌性及自主性。

1990年代以來，世界經濟由快速全球化朝向供應鏈在地化



約1990年~2008年：跨國分工、全球化快速發展

1989：柏林圍牆倒塌 1999：歐元區成立
1990：東西德統一 2001：中國大陸加入WTO
1991：蘇聯解體 2002：台灣加入WTO

2009年~2017年：供應鏈在地化

2009：美國倡議製造業回流
2011：中國大陸提出經濟「再平衡」
2015：中國大陸提出「中國製造2025」

2018年~：供應鏈分流、在地化、區域化

2018：美中貿易爭端爆發
2022：美國通過「晶片法案」
2023：中國大陸祭出關鍵材料出口管制

*前美國財政部長Lawrence Summers等曾以長期停滯(secular stagnation)來描述全球金融危機後，需求疲弱、低利率、低成長、低通膨的經濟情勢。

**過去幾年全球貿易限制措施大增，如2022年全球實施的貿易限制措施即高達2,845項。

***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，國際經濟環境大幅惡化，使得中國大陸以往依賴廉價勞動力的出口發展模式遇到巨大挑戰；此外，中國大陸高經濟成長背後帶來的資源損耗、環境污染、所得不均等各種不平衡問題越來越嚴重，且投資率偏高、國外需求疲軟、人口紅利消退、低成本優勢不再等，也阻礙大陸經濟的持續成長。詳李志強(2018)，「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策略、趨勢與挑戰」，*展望與探索*，第16卷第5期，5月。

(二) 全球化發展的效益

1. 全球貿易、資本及勞動力自由移動，有助提升經濟效率，提高整體生產力及所得。

全球化類型	益處
全球貿易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● 奠基於比較利益(comparative advantage)的產業間貿易(inter-industry trade)* 與全球價值鏈(Global Value Chains, GVC)，有助提升整體生產力及所得。● 企業為降低成本、提升附加價值，基於比較利益，進行國際專業分工，促使全球價值鏈快速發展，參與者皆受益。
資本自由移動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● 國際間資本自由移動，能更有效率地配置儲蓄與投資、加速生產力成長，緩和各國經濟失衡的調整過程，進而有助於全球經濟發展。● 資本自由移動能協助接受國的金融體系更具競爭力，且可隨著引進先進的金融科技，讓國內金融市場更有效率，有助加速生產力成長、經濟多元化及國際化。
勞動力自由流動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● 對移出國而言，此可解決國內勞動力過剩的問題，而由海外匯回國內的匯款，則有助於提升移出國居民的福祉。此外，外移至高收入國家的機會，有助於提高移出國的教育程度，進而提升其整體人力資本與生產力。● 對接受國而言，高技術外來勞動力有助創新，低技術外來勞動力可填補本地勞動力供給短缺的工作(如農業、看護等)，提升經濟效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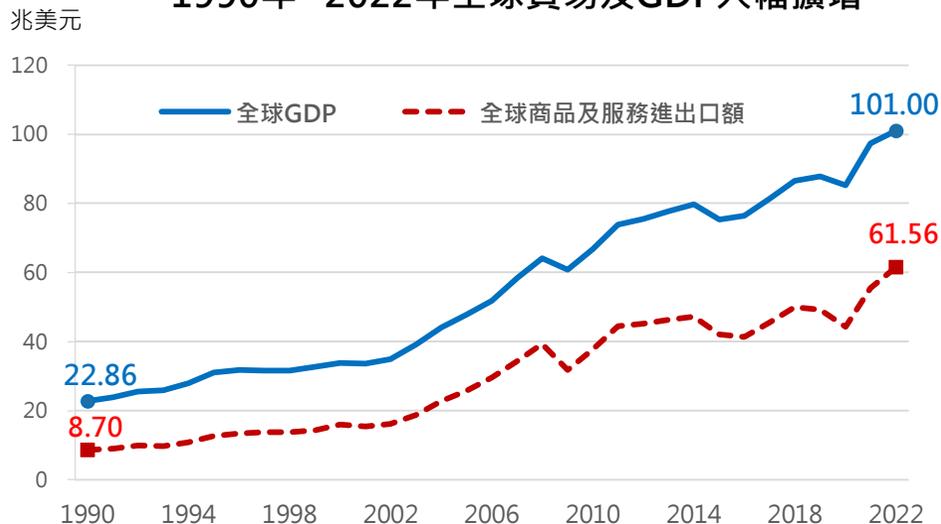
* 產業間貿易係指，在一段時間內，一國的同一產業部門商品只出口或只進口的現象；大多數的貿易屬此類型，其主要係奠基於比較利益的理論基礎。至於產業內貿易(intra-industry trade)則係指，一國出口又進口相同或類似商品；此類型貿易主要由消費者偏好、商品的價格及品質，以及全球供應鏈所驅動。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(2016)。「全球化的發展、問題與未來挑戰」，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，12月22日

2. 全球化發展促進經濟強勁成長、提升全球經濟產出，其中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獲益甚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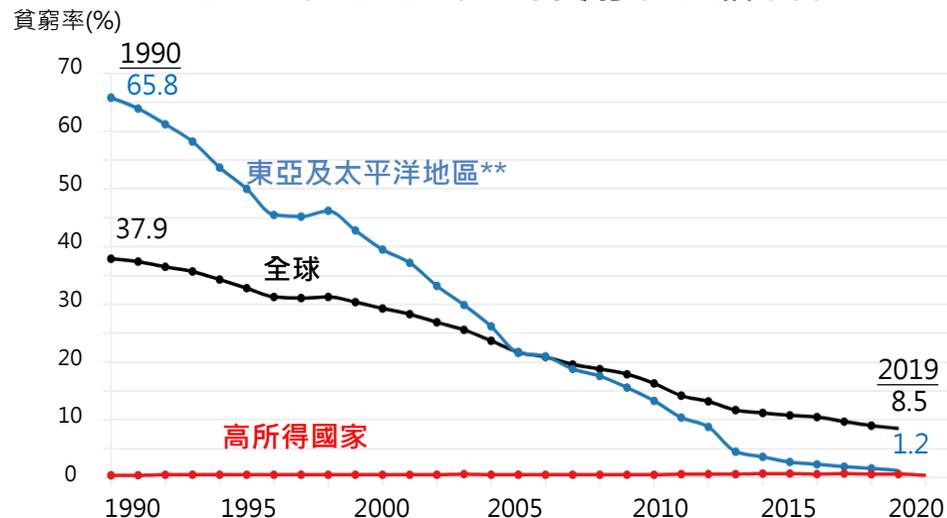
- (1) 1990年~2022年，全球商品及服務進出口額從8.70兆美元增至61.56兆美元(約7.1倍)；貿易成長帶動全球GDP由22.86兆美元擴增至101兆美元(約4.4倍)。
- (2) 全球數億民眾因自由貿易脫離貧困，貧窮率由1990年的37.9%，大幅降至2019年的8.5%，且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降幅尤大。此外，若干東亞國家(如台、韓)由中等所得階段躍升至高所得階段，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經濟體，亦出現大量的中產階級。

1990年~2022年全球貿易及GDP大幅擴增



資料來源：World Bank

1990年~2020年全球貧窮率*大幅下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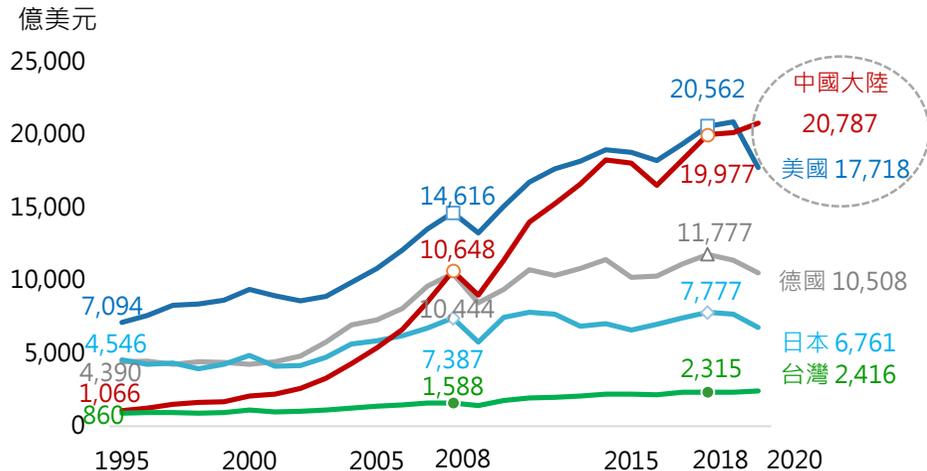


註：*貧窮率係指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占比，貧窮線標準為每人每日收入2.15美元(以2017年PPP衡量)。
**此處之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主要包含中國大陸、印尼、斐濟、泰國、馬來西亞等國家(地區)。
資料來源：World Bank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

3. 全球化快速發展下，各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*；中國大陸等開發中國家為主要獲利者。

- (1) 中國大陸於2001年加入WTO後逐漸成為世界工廠，其所生產之國內附加價值出口鉅幅增加至2020年的20,787億美元，超過美國，為1995年的19.5倍，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；而美國則因製造外包，2020年金額17,718億美元，僅為1995年的2.5倍。在全球貿易體系下，美國向中國大陸大量購買商品，且對中國大陸存在龐大的貿易入超。
- (2) 2020年台灣、德國及日本的國內附加價值出口分別為1995年的2.8、2.4及1.5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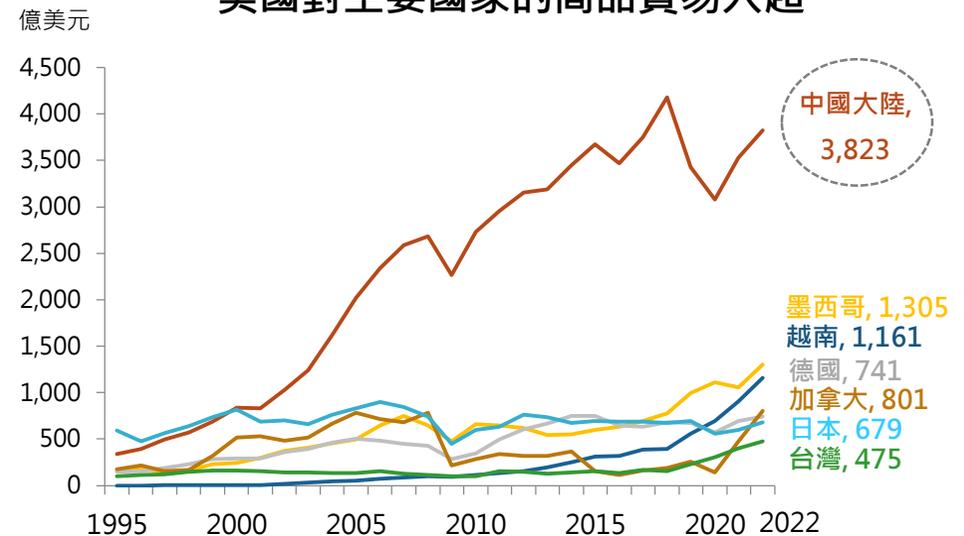
主要國家之國內附加價值出口



註：生產全球化下，中間財多次跨境移動，被重複計算在貿易統計中。傳統貿易統計計算的出口總值，內含進口原物料的價值，致高估國內出口實力，因此將出口總值扣除其中國外創造的附加價值，即國內附加價值出口，以適切反映各國參與貿易活動對經濟的貢獻及各國的競爭力。

資料來源：OECD TiVA資料庫

美國對主要國家的商品貿易入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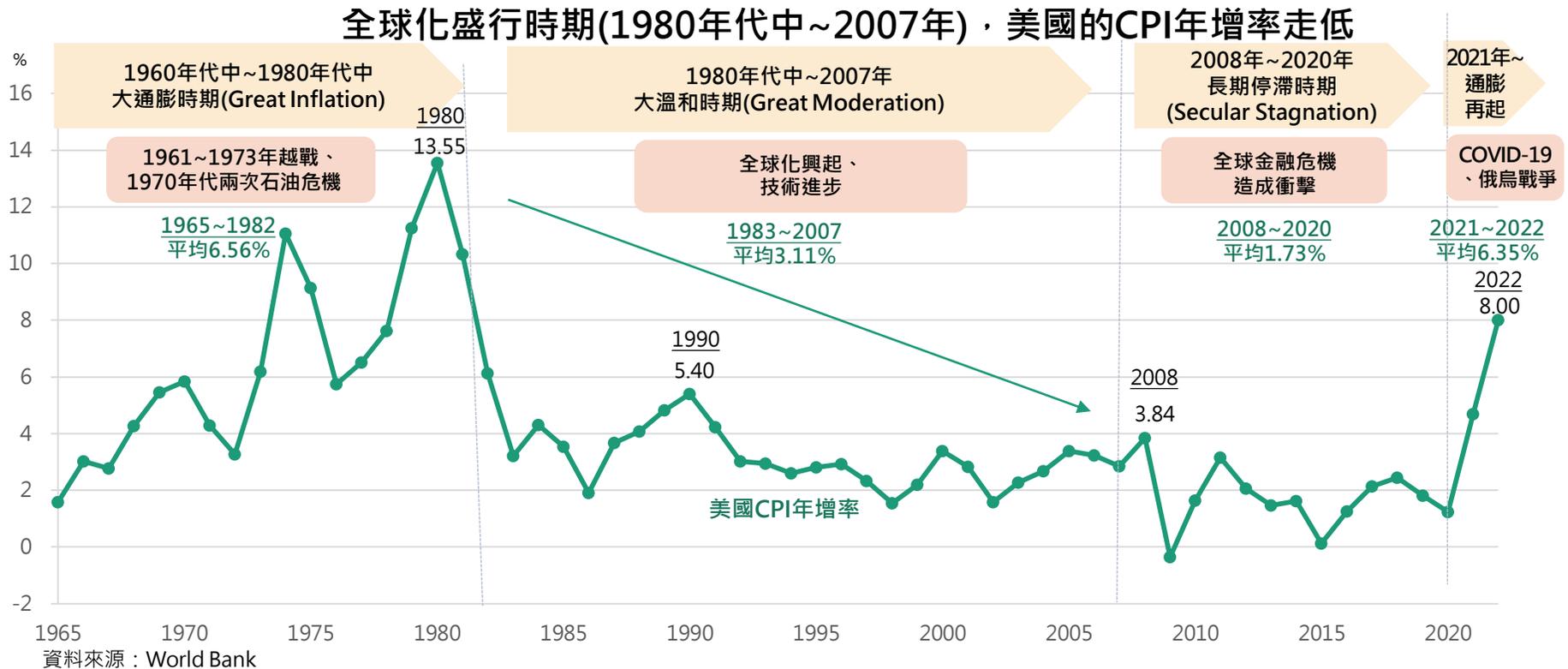
註：2022年美國商品貿易入超總額11,774億美元。

資料來源：美國商務部

*全球價值鏈強調供應鏈各生產階段(如研發、設計、製造、行銷等)所創造的附加價值，相關討論請參考2015年9月24日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。

4. 全球化興起並快速發展，有助於拉低先進經濟體通膨，維持通膨低且穩定。

- (1) 一般認為，全球化使貿易與金融加速整合、供應鏈的生產移轉至低成本地區；此外，中國大陸、東歐國家等大量輸出勞動力，壓低薪資與商品價格，均促使美國等先進經濟體的通膨下降*。
- (2) 全球化扮演巨大的衝擊吸納器(gigantic shock absorber)角色，使供需變化易於透過相應的生產調整滿足，不致引發物價劇烈波動。



*一般認為，1990年代起，除全球化快速發展有助於壓低通膨外，央行獨立性(independence)及通膨目標化(inflation targeting)機制的建立，亦有助維持通膨低且穩定，造就1980年代中~2007年的大溫和時期。

(三)全球化發展產生的衝擊與反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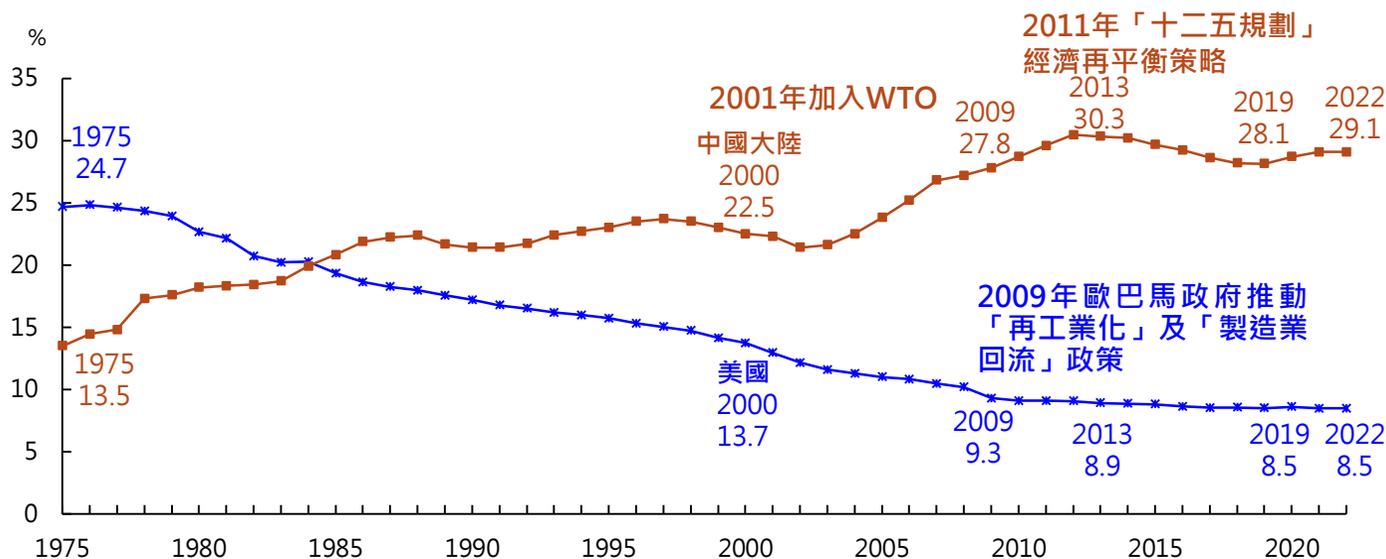
1.全球化發展產生的衝擊

(1)在全球化及技術進步下，**全球勞動力大增**、**生產外包(outsourcing)**帶走先進經濟體的中低階技術工作機會。

一大量勞動力加入全球經濟，**壓抑先進經濟體的勞動報酬**。此外，全球貿易也改變勞雇關係的本質*。

一技術進步及企業生產外包，致先進國家中低階技術工作機會流失；自**1970年代中迄今**，**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重下滑****，至於**中國大陸則上升**。

美中製造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之比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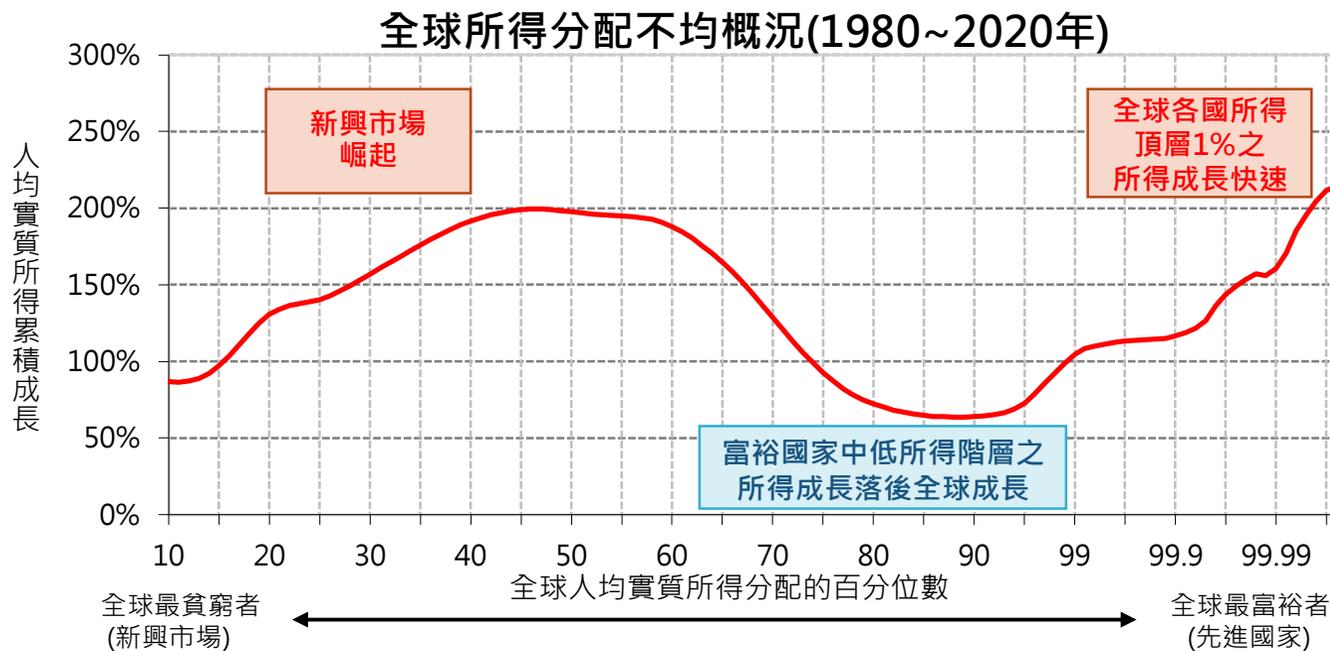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Refinitiv Datastream

*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Rodrik指出，若勞工可不受國界限制被輕易替代，則勞工的收入將會不穩，與雇主的談判力量也會減弱。

**2016年美國暢銷書《絕望者之歌》(Hillbilly Elegy)·敘述美國鐵鏽帶(Rust Belt)白人，因種種阻礙，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，致始終無法脫離底層生活、陷入惡性循環。

(2) 伴隨全球化快速發展，許多國家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的程度提高。

- 全球化雖有助降低全球貧窮率，拉近新興市場國家與先進國家之間的人均所得差距，但許多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均卻擴大*。其中，全球所得分配底層50%的人口(主要是新興市場人口)及頂層1%的人口(先進國家的高所得家庭)受益最多；至於富裕國家中低所得階層因全球化而流失工作機會，致所得成長相對落後，為全球化的受害者。
- 全球化加劇經濟金融動盪、企業避稅操作更容易、金融化利益向富人傾斜，亦加劇財富分配不均；2012~2021年，最富有的1%人口掌握全球新增財富約半數**。



雖然1980~2020年間全球底層與頂層階層之所得均大幅成長，惟

- 全球所得頂層1%之所得成長，即占總成長的23%
- 全球所得底層50%者之所得成長，僅占總成長的9%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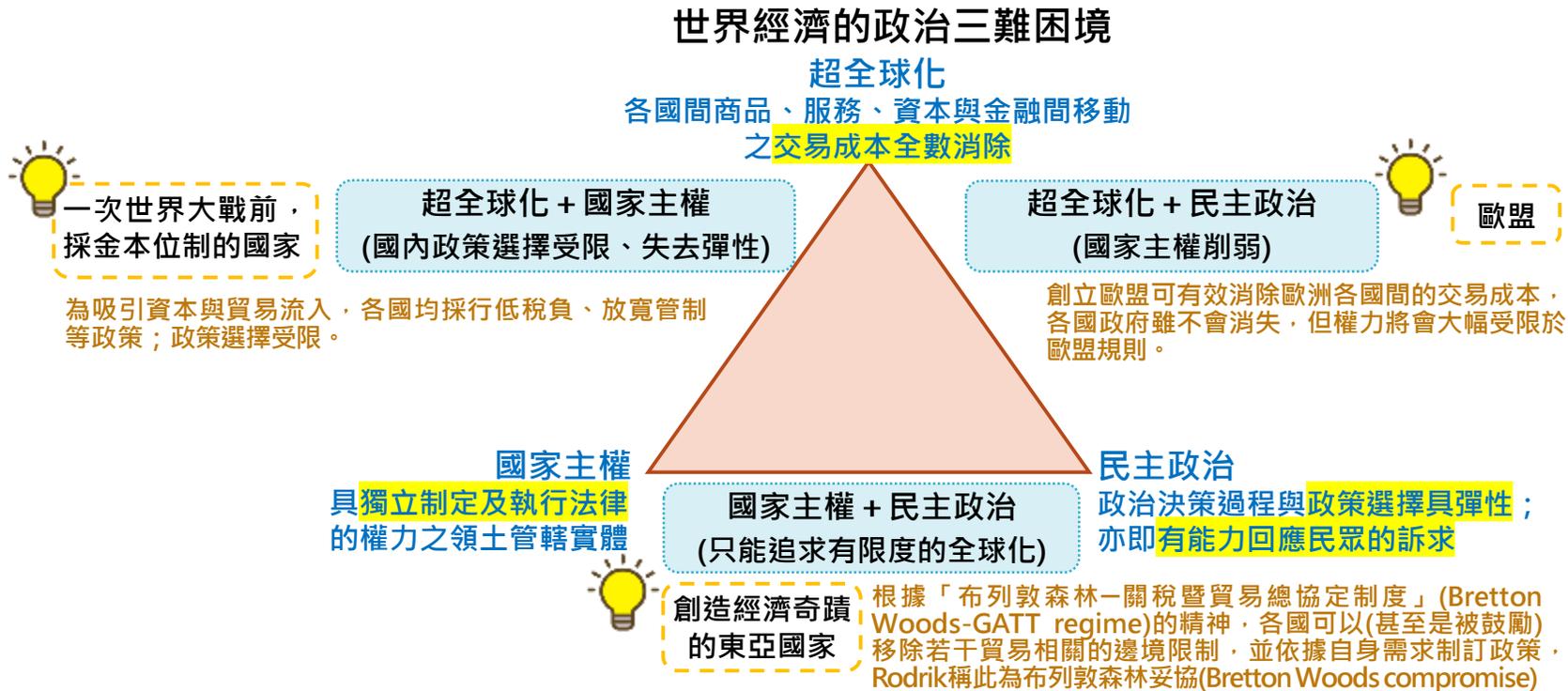
* 所得分配不均擴大的原因錯綜複雜；一般認為，全球化及技術進步為重要因素。

**Christensen, Martin-Brehm et al. (2023), "Survival of the Richest: How We Must Tax the Super-rich Now to Fight Inequality," Oxfam Policy Paper, Jan 16.

2. 對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反思

(1) Rodrik的「三難困境」(Trilemma)

- Rodrik早於1997年《全球化走得太遠了嗎？》乙書，即對全球化示警；他質疑跨境資本移動的好處，對「華盛頓共識」提出批評，強調引領成長的途徑繁多，並非僅有奠基於「華盛頓共識」的經濟成長方案可行。
- Rodrik提出世界經濟的政治三難困境*，即一國無法「同時」、「完全」擁有民主政治、國家主權與超全球化(hyper-globalization)，只能取其二者。



資料來源：Rodrik, Dani (2011), *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: Why Global Markets, States, and Democracy Can't Coexist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Mar.

*Rodrik, Dani (2000), "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?" *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*, Vol. 14, No. 1, pp. 177-186;

Rodrik, Dani (2011), *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: Why Global Markets, States, and Democracy Can't Coexist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Mar.

- Rodrik指出，在**全球化與民主政治*不相容**的前提下，**全球化出現矛盾**；即出現涵蓋「超全球化」、「民主政治」與「國家主權」的**三難困境**。
- 鑑此，Rodrik於**2000年預言**，**未來20年全球經濟可能走向各國政府訴諸保護主義**。歷經**2016年英國脫歐(Brexit)**、**川普(Donald Trump)當選美國總統**等事件後，有論者認為，**2016年堪稱羅德里克時刻(Rodrik moment)****。
- 面對全球化矛盾，Rodrik認為，各國有權保護其制度性安排，並捍衛相關管理措施的完整性；**通往繁榮的路不只一條，各國應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制度**。

(2) Palley的「兩難問題」(Dilemma)

- 美國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首席經濟學家Thomas I. Palley指出，**不論一國的政治決策過程為民主或獨裁，皆可追求全球化**；**全球化並非自然形成，而是經過設計，因此有不同面貌，反映出不同的政治偏好**。
- Palley主張，實務上，民主強調的是「政治決策過程」，而Rodrik民主政治概念所包含的「政策選擇」，即是Palley所謂的「政策空間」；故究諸實際，Rodrik與Palley的想法並無二致，均強調若一國過度追求全球化將會限縮自身政策空間***。

* Rodrik指的民主政治，其概念較廣泛，包含政治決策過程與政策選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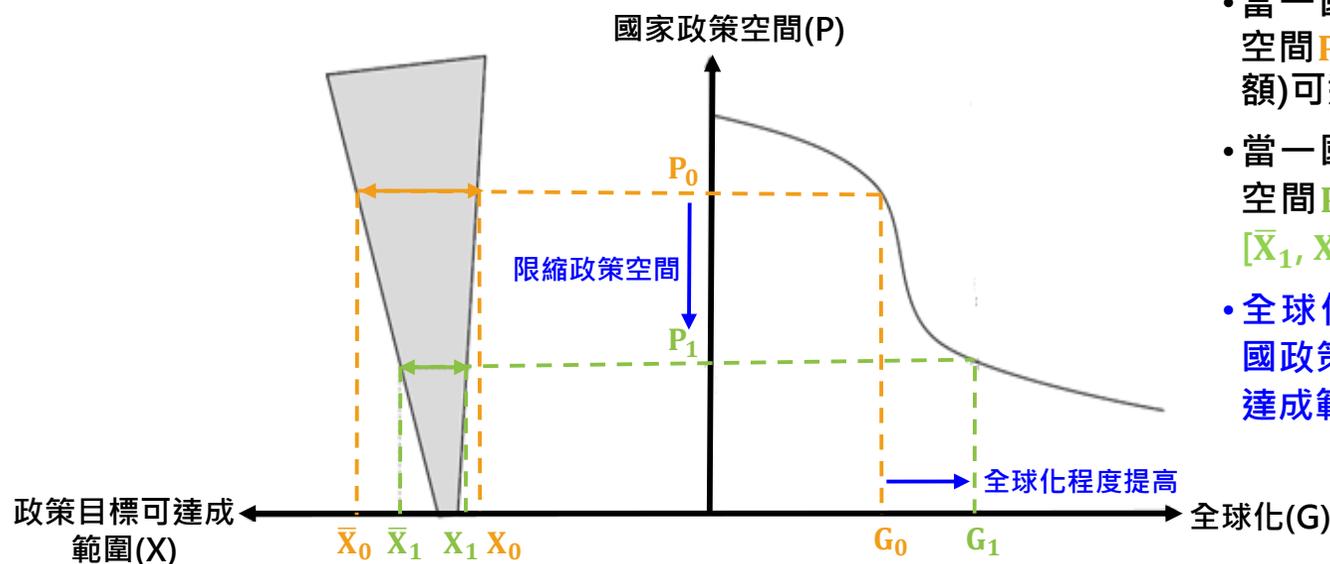
** Bolotnikova, Marina N. (2019), "The Trilemma," *Harvard Magazine*, Jul.-Aug.

*** Palley, Thomas I. (2017), "The Fallacy of the Globalization Trilemma: Refra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," *FFM Working Paper*, No. 08, Hans-Böckler-Stiftung, Macro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(IMK), Forum for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(FFM), Düsseldorf.

- 一 惟Palley主張，隨**全球化提高**，將**限縮一國政策空間及政策目標可達成範圍**；「三難困境」實際上應為「全球化提高」與「國家政策空間降低」之「**兩難問題**」*；而**國家主權亦應視為國家政策空間**，**提高全球化會降低國家政策空間**，進而降低國家主權。

根據Palley的理論，全球化與國家政策空間的交互關係可表示如下：

全球化與國家政策間的交互關係



- 當一國全球化程度為 G_0 ，此時，政策空間 P_0 ，而政策目標* (例如，勞動份額) 可達成範圍則為 $[X_0, X_1]$
- 當一國全球化程度為 G_1 ，此時，政策空間 P_1 ，而政策目標可達成範圍則為 $[X_1, X_1]$
- 全球化程度提高 ($G_0 \rightarrow G_1$)，將限縮一國政策空間 ($P_0 \rightarrow P_1$)，以及政策目標可達成範圍 ($[X_0, X_0] \rightarrow [X_1, X_1]$)

*實務上，一國政府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可能相當繁多，包括：經濟成長率、就業、分配均等及政經社會穩定等。

說明：為方便以二維圖形說明相關概念，此處以單一政策目標進行分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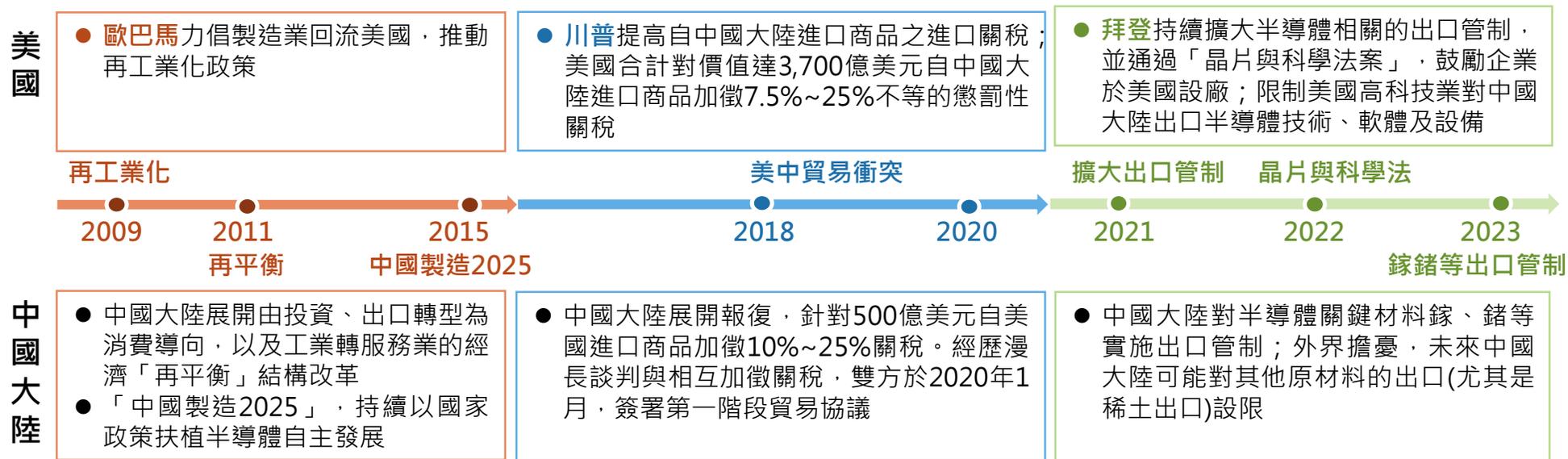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Palley, Thomas I. (2017), "The Fallacy of the Globalization Trilemma: Refra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," *FMM Working Paper*, No. 08, Hans-Böckler-Stiftung, Macro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(IMK), Forum for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(FFM), Düsseldorf.

*Palley, Thomas I. (2017), "The Fallacy of the Globalization Trilemma: Refra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," *FMM Working Paper*, No. 08, Hans-Böckler-Stiftung, Macro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(IMK), Forum for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(FFM), Düsseldorf.

- 全球化除限縮國家政策空間外，Palley亦認為，全球化亦會扭轉國家政策空間及組合。例如，當一國追求超全球化時，其強調解除市場管制，反對政府干預，主張資本完全自由移動，此政策將不利該國國內勞工權益及部分產業，進而可能引發國內政治動盪和不穩定，及影響其政策走向。
另當一國著重保障國內勞工及產業時，其政策則較傾向政府管制、提倡社會福利，以及反對貿易自由開放；使得該國在加入全球化體系，其各項開放市場之措施將相對謹慎。
如以美國及中國大陸為例，在全球化發展下，美國面臨製造業就業機會流失等問題；而中國大陸亦面臨所得分配不均等挑戰。基此，近年來美、中均重新調整全球化腳步。
- 此外，Palley提出，全球化將帶來政策鎖定(policy lock-in)效果，即一國政經結構受全球化發展而定型，致逆轉或取消原政策的代價高昂。例如，企業在全球化過程中已投入大量成本，如重新布局、建廠等所費不貲，將傾向說服政府留在全球化體系。
- 另一方面，若一國無力處理當前問題的成本，高於離開現行體制的成本，一國便會打破體制，如英國脫歐即為一例。
- Palley提出，為了解決全球化造成之外部性和逐底競爭問題，有賴主要經濟體透過國際政策協調(如國際締約)，來制定基本規範。

(3) 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，近年美、中均重新調整全球化的腳步，祭出不同因應政策。

面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，美、中採行因應措施



過去美國力倡自由貿易，惟全球化盛行下，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大陸存在龐大的貿易逆差，且中國大陸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挑戰美國第一大經濟體地位，美國祭出保護主義措施。

美國

- 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力倡製造業回流美國，並推動再工業化政策。
- 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，除力促製造業回流美國外，更高舉「美國優先」(America First)大旗；2018年起大採保護主義措施，對中國大陸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等，希望削減此鉅額的貿易逆差，中國大陸隨即採取報復措施，引發美中貿易衝突。
- 2019年起，美國逐步加強對中國大陸取得半導體設計、製造技術之管制；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上任後，持續擴大半導體相關的出口管制，中國大陸亦予以反制。

美國 (續)

- 當前為**加強經濟、國家、能源與氣候**等各方面安全，「**拜登經濟學**」(Bidenomics)支持**針對性投資**，美國**改變過去大力支持自由貿易**的態度，漸轉向**重視國內產業政策**。此除反映「**全球化提高**」與「**國家政策空間降低**」之**兩難問題**外，亦陷入兩強相爭的「**修昔底德陷阱**」(Thucydides's Trap)*。
- 美國等西方民主國家倡議的**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價值**，與中國大陸的政經社會現況，兩者存在**根本差異**；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下，隱性的**不公平競爭與價值觀差異**，勢將引發衝突；近來美國與若干西方民主國家結盟，以「**降依賴、去風險**」的倡議，力求與中國大陸抗衡**。

中國大陸

- 中國大陸歷經**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**後，2011年後**調整經濟發展路線**，推行轉向內需的「**再平衡**」經濟結構改革，2015年進一步訴求躋升製造業強國的「**中國製造2025**」***。
- 伴隨**全球化發展**，**資本主義向前推進**，恐與中國大陸體制產生衝突；為避免**民營陸企**(尤其是科技巨擘)在全球化發展中日漸壯大，進而對**國有企業利益與既有政治體制**形成挑戰，中國大陸除**強化產業監管**外，並強調「**反壟斷**」、促進「**共同富裕**」，加強對**民營企業的整治**等。
- 面對西方國家的抗衡，2023年中國大陸新上任的國務院總理**李強**表示，**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從未改變**，未來政策將著重「**李強經濟學**」的**三支箭**，即發展**民營經濟、開放招商引資及促進產業升級******。

*「修昔底德陷阱」係指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，而現存大國亦勢將回應這種威脅，讓戰爭不可避免；過去500年中，新崛起的強權挑戰舊強權的實例共有16次，其中的12次是訴諸兵戎，兩敗俱傷，僅4次以和平告終。見Allison, Graham (2017), *Destined for War: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's Trap?*, Mariner Books.

**朱敬一、羅昌發、李柏青與林建志(2023), *價值戰爭：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*，衛城出版；Rodrik, Dani (2011), *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: Why Global Markets, States, and Democracy Can't Coexist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Mar.; Palley, Thomas I. (2017), "The Fallacy of the Globalization Trilemma: Refra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," *FMM Working Paper*, No. 08.

*** 中國大陸資通訊產品在全球市占率居首，惟其關鍵技術及積體電路等中間投入依賴進口，2015年提出「中國製造2025」計畫，強調發展尖端科技擺脫對外依賴。

**** 「李強經濟學」看似與「拜登經濟學」打對台，擁護全球化；惟細究政策內涵，實隱含著以一國之力引導國內產業發展，並非全然擁抱全球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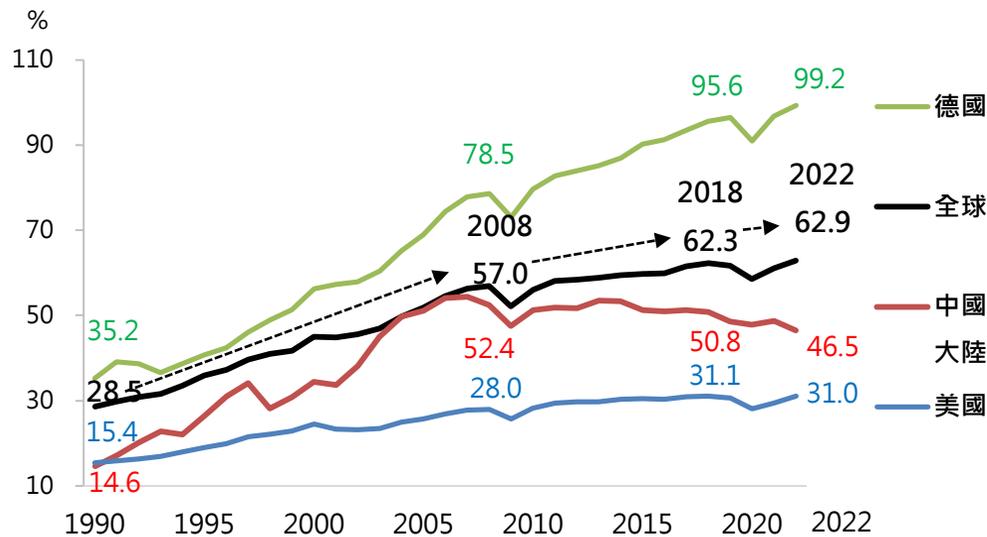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全球金融危機後，全球化減速，重塑各國貿易及投資結構

(一)全球供應鏈分流、朝在地化發展，對外直接投資趨於零碎化

1.目前各國貿易及FDI的對外連結程度仍高，惟全球化的步調已走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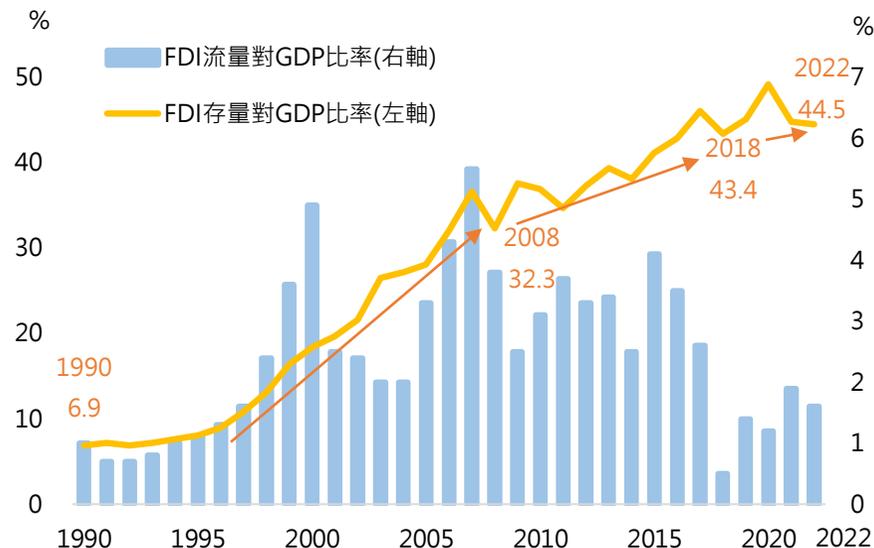
- (1)全球實質商品及服務輸出入對GDP比率，由1990年之28.5%大幅上升至2008年(全球金融危機)之57.0%，至2018年(美中爭端)續升為62.3%，至2022年則緩升為62.9%。
- (2)全球FDI存量對GDP比率，由1990年之6.9%大幅上升至2008年之32.3%，至2018年續升為43.4%，至2022年則緩升為44.5%。

全球與主要國家實質商品及服務輸出入對GDP比率



註：按US\$ at 2010 prices基礎計算。
資料來源：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

全球FDI對GDP比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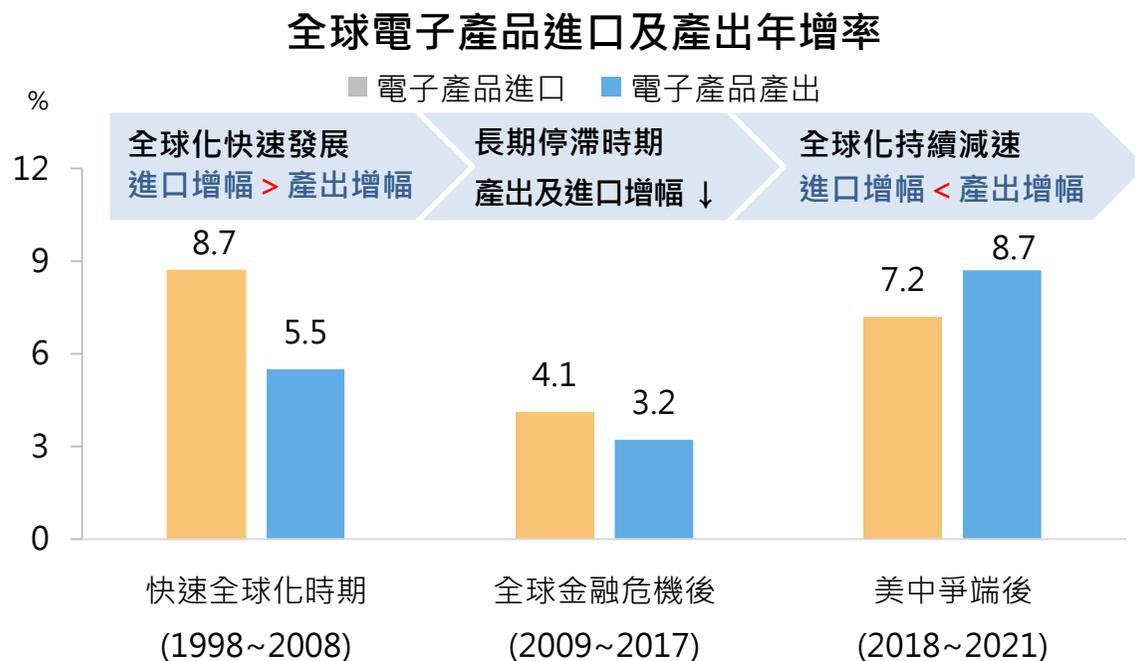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

2.地緣政治風險升高，國安意識抬頭，全球供應鏈分流、朝在地化發展；FDI趨於零碎化，全球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趨緩*，東協則吸引全球FDI的青睞

(1)2018年以來，美中對抗加劇、疫情及俄烏戰爭爆發，主要國家積極進行國際結盟，加大政策力道重塑全球供應鏈，推動生產回流(reshoring)及友岸外包(friendshoring)，降低關鍵物資及策略產業對競爭對手的依賴。

(2)2018年後，各國高科技產品在地化生產更明顯。

—2018~2021年全球電子產品產出平均年增率8.7%，高於該產品進口平均年增率7.2%；此與快速全球化時期電子產品進口年增率8.7%，明顯大於產出年增率5.5%，形成對比。



資料來源：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(2023), "Macroeconomic Review," MAS Macroeconomic Review, Volume XXII Issue 1, Apr..

*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WTO後，曾高度吸引全球FDI，與供應鏈上下游進行跨國產業專業分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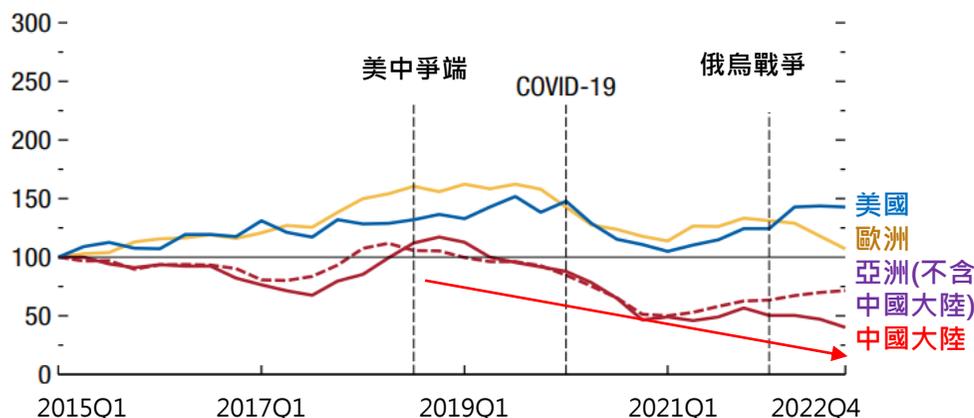
(3)2018年起，隨歐美限制企業對中國大陸關鍵經濟領域的投資及出口，加以中國大陸經營環境惡化*，全球FDI趨於零碎化。

- 美中爭端及俄烏戰爭推升地緣政治緊張情勢，歐美重新思考中國大陸科技發展可能帶來國安及資安疑慮，調整對中策略，全球對中國大陸的新設投資**(greenfield FDI)趨緩，其中，對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投資的減緩程度最為明顯。
- 2021年以來，各國加速推動關鍵物資生產在地化，FDI對美國、歐洲及亞洲(不含中國大陸)策略產業的新設投資回升，尤其擴大這些地區半導體產業的布局。

全球對策略產業新設投資的地區別分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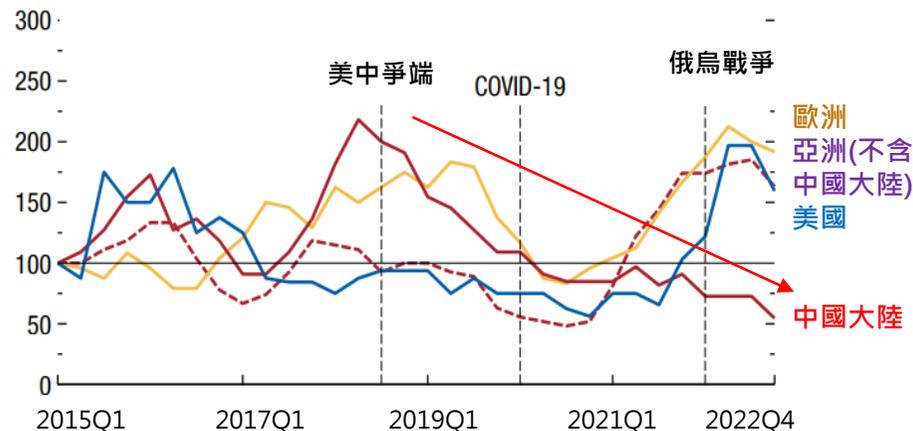
A. 整體策略產業*

2015Q1=100
4季移動平均



B. 半導體產業

2015Q1=100
4季移動平均



註：*策略產業包括塑化及合成橡膠製造、電池及蓄電池製造、焦爐產品製造、消費電子產品製造、家用電器製造、電子元件及電路板製造、一般機械製造、測量測試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、鐘錶、機動車輛製造、其他非金屬礦物產品製造、藥品藥用化學品及植物產品製造、有色金屬礦的開採、石油及天然氣開採的輔助活動等。本圖FDI係採新設投資之數量。

資料來源：IMF (2023), *World Economic Outlook*, Apr.

*近年中國大陸生產成本優勢下滑、環保法規趨嚴，2018年起，美中爭端加劇，2021年推動「產業監管」、「共同富裕」等，以及2022年施行嚴格防疫封控措施，經營環境惡化，

**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(WIR)將FDI區分為跨國併購(M&A)及新設投資(greenfield FDI)，其數據資料分別來自路透社及金融時報。

(4)美中爭端下，東協同時為中國大陸產業整合及美國策略聯盟的夥伴，吸引全球FDI的青睞。

東協的3大優勢

①與中國大陸產業整合

- 自然資源豐富、年輕勞動人口眾多
- 地理位置近中國大陸、為一帶一路國家
- 與中國大陸同為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」(RCEP)成員，有利相互運用市場與生產線

②銜接美國市場

- 美國推出友岸外包及印太經濟架構(IPEF)，聯合盟友建構關鍵供應鏈的安全

③與台、日、韓等供應鏈上游國家經貿往來密切

- 屬台灣新南向國家，彼此產業鏈結深厚
- 與日、韓同為RCEP成員，且東協中的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越南及汶萊與日本亦同為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」(CPTPP)成員

美中爭端下，東協在3大領域獲益

①美中貿易戰轉單東協

②美中科技戰轉移中國大陸科技產品產線至東協

③全球FDI對東協投資增加，比重由2019年的9.8%，增加至2022年的17.2%

全球FDI流入主要地區別比重



註：2022年全球FDI淨流入合計12,947.4億美元，其中，歐盟呈淨流出。
資料來源：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, UNCTA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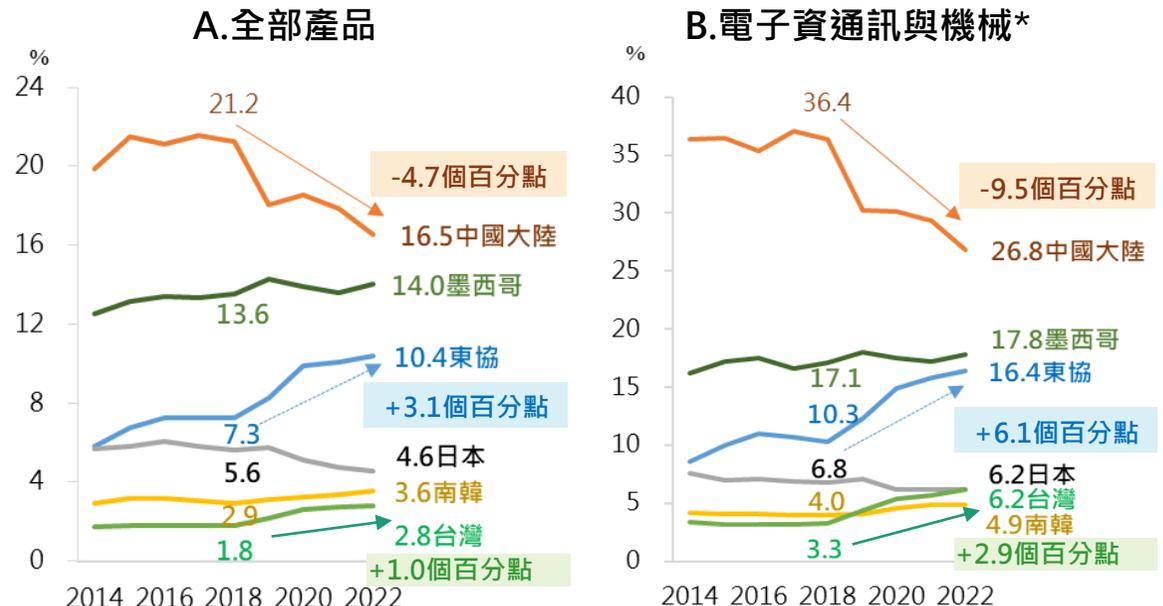
(二)伴隨全球供應鏈重組，美國與中國大陸彼此的貿易依賴程度下降，對東協的貿易往來則升溫

1.當前全球供應鏈分流，以輸美供應鏈的調整為主；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下降，自東協進口比重上升

(1)美國市場：美國自中國大陸進口比重下降，2022年為16.5%，較2018年下降4.7個百分點；同期間，自東協及台灣進口比重分別上升3.1、1.0個百分點(圖A)。

—電子資訊與機械產品為美中科技角力焦點，中國大陸在美國市場該類產品比重下降尤其明顯：2022年市占率較2018年下降9.5個百分點，東協及台灣的市占率分別上升6.1及2.9個百分點(圖B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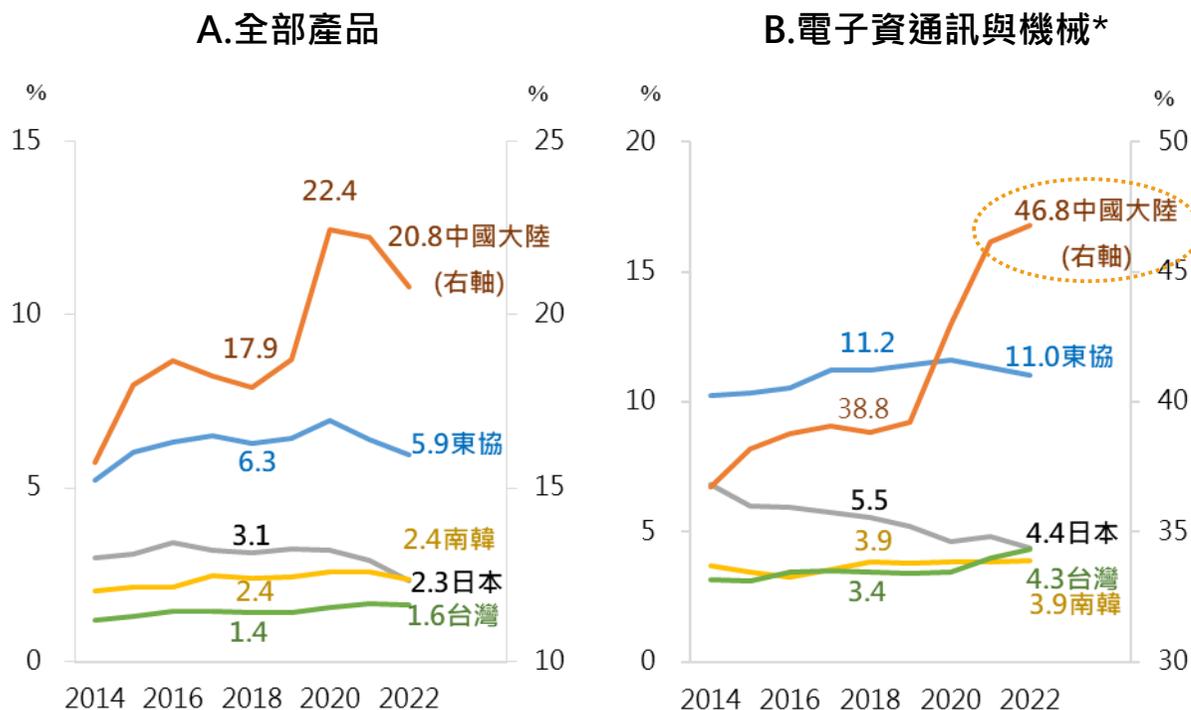
美國自主主要國家進口比重



註：*採通關稅則號列HS84及HS85合計。 資料來源：美國商務部

(2) 歐盟市場：中國大陸產品的市占率仍呈現相對強勢，未如在美國市場呈明顯下降(圖A)；尤其2022年電子資通訊與機械產品的市占率上升至46.8%之新高(圖B)。

歐盟自主主要國家進口比重



註：*採通關稅則號列HS84及HS85合計。
資料來源：S&P Globa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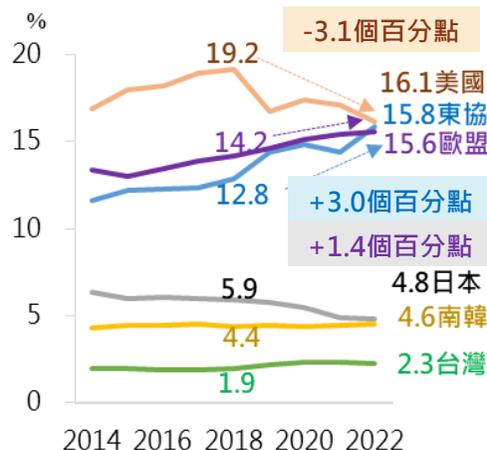
2. 中國大陸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，對美國的出口比重下降，對東協的出口比重上升；另部分中國大陸產線移至東協，間接由東協出口給美國

(1) 中國大陸與美國貿易壁壘持續，2022年對美國出口比重16.1%，較2018年下降3.1個百分點；隨中國大陸多元布局出口市場，同期間，對東協及歐盟出口比重分別上升3.0、1.4個百分點(左圖A)。此現象在電子資通訊與機械產品尤然(左圖B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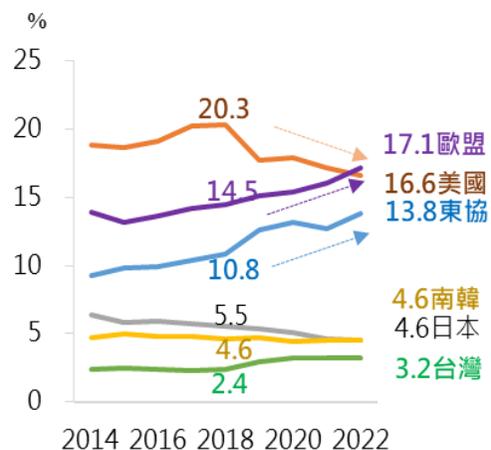
(2) 全球供應鏈重組，貿易轉向的效應下，2022年東協自中國大陸進口金額較2018年成長近6成(中圖)，對美國出口金額亦成長超過9成(右圖)。

中國大陸出口至主要市場之比重

A. 全部產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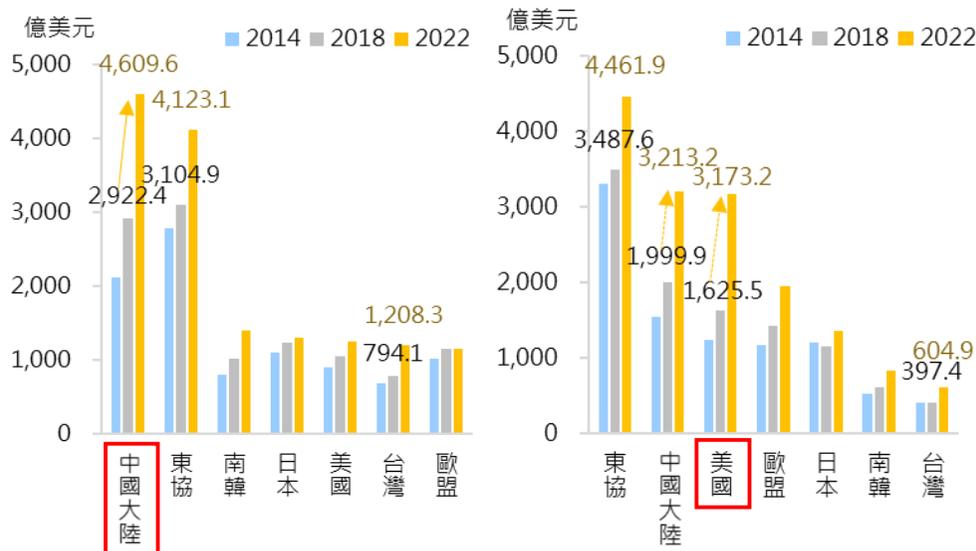


B. 電子資通訊與機械*



註：*採通關稅則號列HS84及HS85合計。
資料來源：S&P Global

東協自主要國家進口金額 東協出口至主要國家金額



資料來源：ITC Trade Map

資料來源：ITC Trade Ma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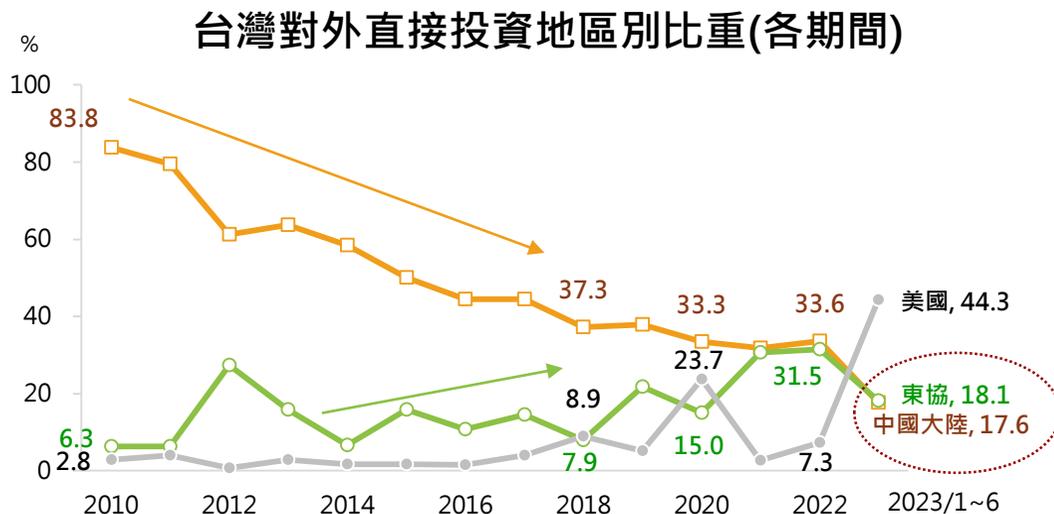
三、我國廠商因應變局，多元生產布局，強化供應鏈韌性

(一)順應供應鏈重組，台廠進行全球產能調整，擴大在台及東協產能，在中國大陸產能則增加供應當地內需比重

1.中國大陸經營環境惡化，削弱台商赴陸投資意願，加以因應國際品牌商及美國安全供應鏈之要求，台商多元生產布局，擴大在台及東協產能

(1)2018年以來，台灣對外直接投資中，投資於東協比重多呈增加，2023年上半年比重18.1%，超過在中國大陸投資比重17.6%。

- 例如，我國六大消費性電子組裝代工廠鴻海、仁寶、緯創、和碩、英業達、廣達，皆已赴東協投資。
- 2020年及2023年上半年，台積電赴美投資，推升投資美國比重，致投資東協比重相對下降。

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投審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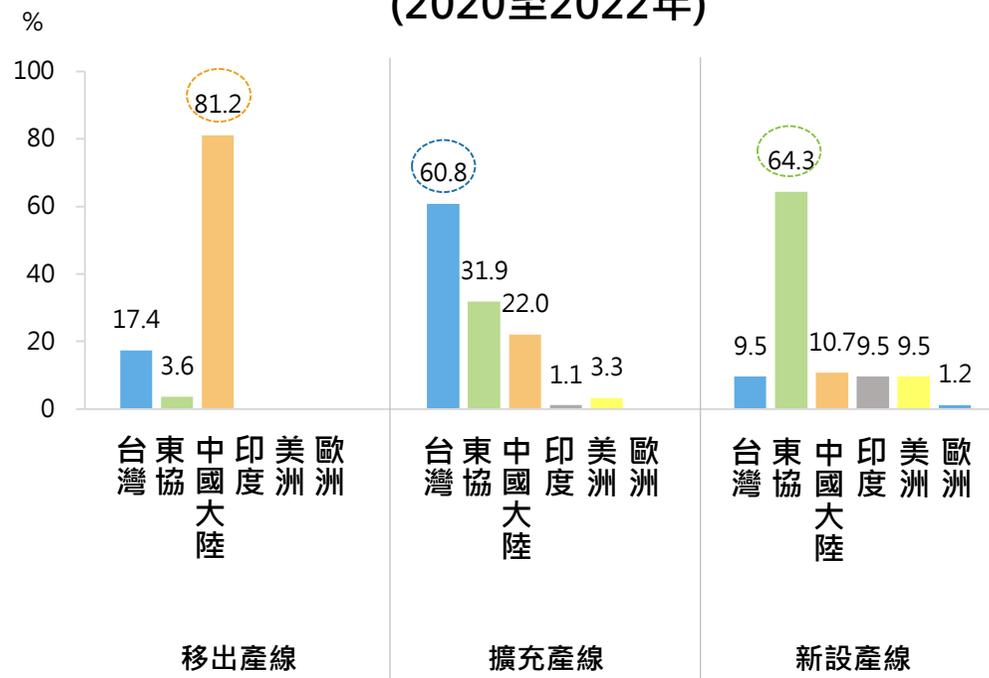
(2) 台灣外銷廠商因應變局，進行產線跨國移轉；2020至2022年移出產線的地區，主要為中國大陸；擴充及新設產線的地區，分別以台灣及東協為主。

一移出產線者，自中國大陸移出最多，家數比重81.2%。

一擴充產線者，在台灣為首，家數比重約6成，在東協及中國大陸的家數比重分別約3成及2成。

一新設產線者，在東協最多，家數比重64.3%，在台、陸、印、美的家數比重各約1成，反映廠商建置多元供應鏈。

台商移出及擴充、新設產線之家數比重 (2020至2022年)



註：根據經濟部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，2020、2021及2022年有自行生產之外銷廠商中，有進行產線跨國移轉的家數比重分別為4.9%、6.4%及4.2%。上圖地區別家數別比重，係來自自行進行產線跨國移轉之受查者分析。調查選項可複選，故各項比重加總不等於100%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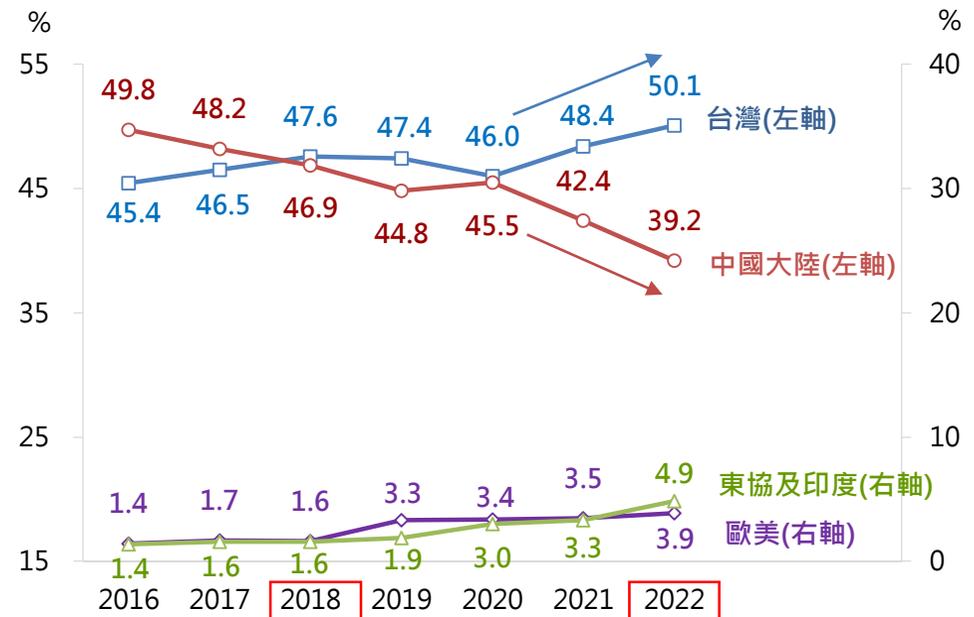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統計處「2023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統計」

(3)近年隨台商多元生產布局，國內廠商外銷訂單中，在中國大陸生產比重下降，而在台灣、東協及印度、歐美生產比重上升，反映台廠供應鏈移轉之效應。

—2018年起，國內廠商外銷訂單在台灣生產比重居首，2022年達50.1%；在中國大陸次之，比重近4成。

—2022年與2018年相較，在中國大陸生產比重下降7.7個百分點，在東協及印度、台灣、歐美生產比重分別上升3.3、2.5及2.2個百分點。

台灣外銷訂單在各地生產比重



註：其他地區生產比重很小，上圖未列出。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統計處「2023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統計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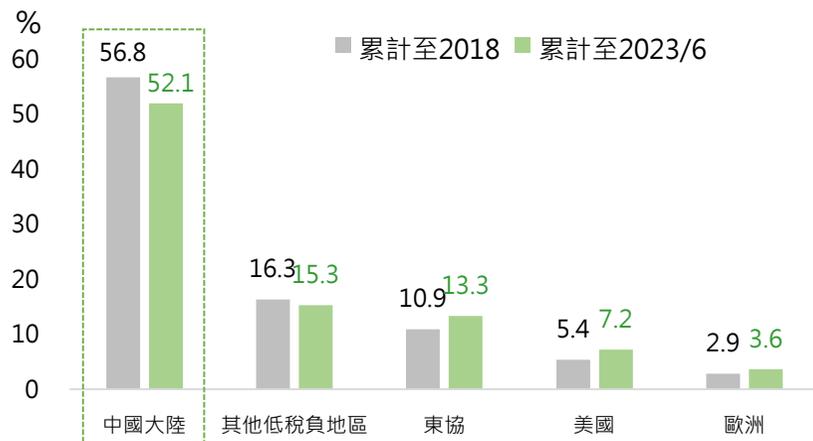
2.因應美中對立，台廠在中國大陸產能增加供應當地內需比重

(1)近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FDI持續放緩；台灣對中國大陸累計FDI占整體累計FDI之比重由2018年底之56.8%，降至2023年6月底之52.1%，惟**中國大陸仍為台灣最大的海外投資地**。

(2)美中對立下，台廠採取「**在陸生產，銷售大陸**」(In China, for China)策略，降低在中國大陸生產再出口至美國之比重，而**擴增銷售當地的比重*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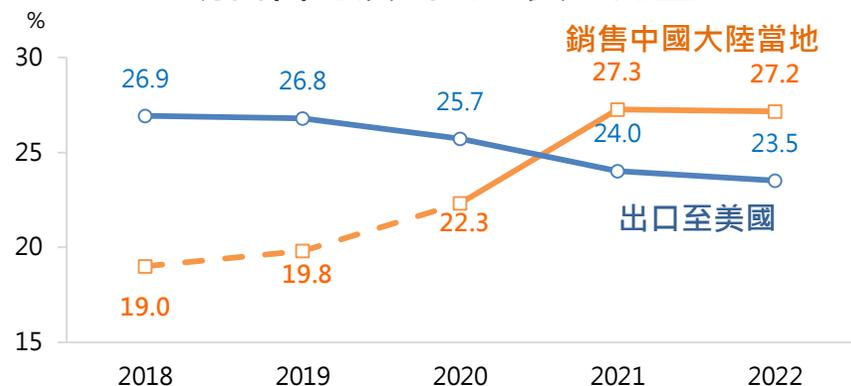
— 2022年台廠國內接單在中國大陸生產的貨品中，**出口至美國**的比重降至23.5%，較2018年下降3.4個百分點；而**銷售中國大陸當地**的比重則升至27.2%。

台灣對外直接投資地區別比重



註：其他低稅負地區係含百慕達、加勒比海英國屬地、巴拿馬及薩摩亞。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投審會

台廠國內接單在中國大陸生產銷售當地及出口至美國比重



註：2018及2019年國內接單在中國大陸生產貨品中，銷售中國大陸當地的比重付關，而因國內接單中，在中國大陸生產占海外生產的比重約9成，故該兩年比重係按海外生產貨品中，銷售中國大陸當地比重之增減百分點推估。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統計處「2023年外銷訂單海外生產實況調查統計」

(二) 隨著半導體成為戰略物資，美、日、歐等主要國家拉攏台廠前往設廠；台灣半導體大廠多元布局，降低國際客戶對供應鏈中斷風險的疑慮

1. 近年主要國家積極推動半導體產業在地化，吸引全球FDI投資增加。

(1) 半導體涉及科技發展、經濟成長及國安等廣泛層面，已成為各國戰略物資，主要國家相繼以國家政策促進半導體自主化，爭取全球資金至境內設廠投資。

近年主要經濟體促進半導體自主化政策

經濟體	政策名稱	重要措施
美國	晶片與科學法案	527億美元政府補貼(包含390億美元製造補貼，及110億美元研發補貼)並提供25%投資稅負抵免
中國大陸	可能再推出新的財政刺激計畫或採其他方法扶持本土廠商	規劃1兆元人民幣進行補貼與抵稅，或改採其他方式，如降低本土廠商使用半導體材料的成本
歐盟	歐洲晶片法案	430億歐元打造在地晶片供應鏈
南韓	K半導體戰略 韓版晶片法案	未來10年南韓半導體相關企業計劃投資510兆韓元 投資半導體最高可享25%稅額抵減
日本	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及半導體補充預算法案	2021年7,740億日圓及2022年追加13,036億日圓補充預算，支持國內半導體生產及先進技術研發
台灣	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	研發支出享25%稅額抵減、購買先進設備享5%稅額抵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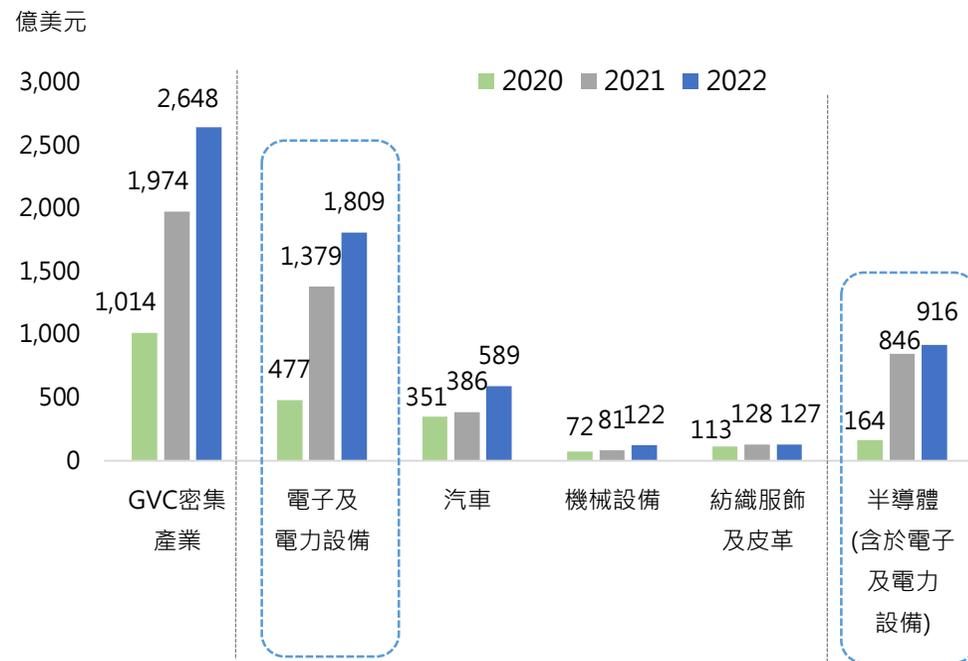
註：為發展本土半導體業，中國大陸自2000年起即陸續推出各類補貼、低利貸款、優惠稅率等政策扶植半導體業；尤其2014年成立國家大基金，直接投資半導體業，2015年「中國製造2025」目標2025年半導體自給率達到70%，2016年則以「十三五」國家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支持半導體全面技術自主與在地化發展。目前新的財政刺激計畫尚不明朗。

資料來源：媒體報導

(2) 因應供應鏈風險及重組壓力，近年**全球FDI對GVC密集型產業的新設投資明顯增長**，尤其在**電子及電力設備領域的投資增額最大***。

— 2022年，在已宣布的全球FDI前5大新設投資案中，在**半導體領域**的投資即占**3項**，包括**台積電赴美興建晶圓廠**、**鴻海與印度Vedanta合資在印度境內設立半導體晶圓廠****、**美商Intel在愛爾蘭增資案**。

全球FDI對GVC密集型產業的新設投資
(2020至2022年)



註：全球價值鏈(GVC)密集型產業包括(1)電子及電力設備、(2)汽車、(3)機械設備、(4)紡織服飾及皮革等4產業。

資料來源：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, UNCTAD

* 主要取材自聯合國「2023年世界投資報告」。

** 2023年7月10日鴻海宣布不再參與雙方合資公司的運作，未來該合資公司將完全改由Vedanta 100%持有。詳證交所公開資訊觀測站—重大訊息與公告。

2.台灣半導體大廠赴美、日新建晶圓廠，多元布局。

- (1)全球10奈米以下先進晶片製造集中在台灣，美、日、歐主要國家為確保供應鏈安全，推出優惠政策，拉攏半導體大廠前往設廠。
- (2)台積電於2020年及2021年分別宣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及日本熊本市興建晶圓廠，且2022年擴大在美增建新廠；此外，亦評估在熊本增建新廠，以及在歐洲建置車用特殊製程晶圓廠，擴大全球布局。

3.國內半導體大廠多元布局的益處與挑戰：

所創造之益處

- ① 對業者之益處：可鞏固大客戶訂單，並爭取創新應用新訂單。
- ② 對半導體供應鏈之益處：目前台廠9成產能集中在台灣，全球布局可降低國際客戶對供應鏈中斷風險之疑慮；此外，深化與美日合作，有助台廠持續推進先進技術。
- ③ 對台灣總體經濟之益處：多元布局可望紓解台灣資源集中半導體業的壓力。

帶來之挑戰

- ① 對業者之挑戰：美國建廠及營運成本高於台灣，且台美企業文化差異，可能在經營管理及競爭面臨挑戰。
- ② 對半導體供應鏈之挑戰：若美國要求台廠升級當地製程與規模，恐削弱台灣半導體產業聚落完整性。
- ③ 對台灣總體經濟之挑戰：晶片在台製造集中度下降，恐影響台灣投資與就業動能。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(2023)。「從台積電擴大赴美設廠看台灣半導體產業之發展與挑戰」，內部參考報告。

四、隨我國廠商多元布局，其對外直接投資與三角貿易跨境資金的地區別流向也出現變化

我國廠商持續強化海內外營運布局，並靈活運用外匯指定銀行(DBU)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(OBU)帳戶進行跨境資金調度*。

觀察國人透過銀行匯款地區別資料(金流資料)的變化，亦可反映出近年我國廠商供應鏈移轉的變化。

近年伴隨供應鏈布局的調整，我國廠商金流的變化，主要呈現在：

- (1) 對外直接投資項目：隨台廠增加對東協與美國投資、減少對中國大陸投資，國人對東協與美國之直接投資淨匯出比重增加，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淨匯出比重則減少。
- (2) 三角貿易項目：隨台廠擴大在東協的產能，逐漸增加「台灣接单、東協生產、外銷美國」三角貿易營運，國人對東協與新加坡之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上升。

*有關「國內銀行(DBU與OBU)為我國企業跨境資金調度之重要據點」說明，另詳附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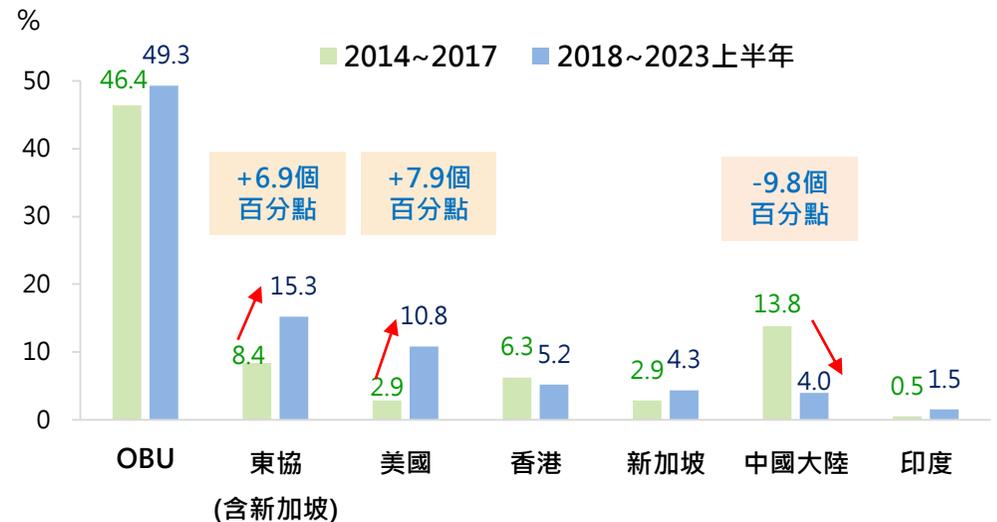
(一)隨台廠增加對東協與美國投資、減少對中國大陸投資，國人對東協與美國之直接投資淨匯出比重增加，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淨匯出比重則減少

1.國人透過DBU對外直接投資淨匯出中，近年對東協及美國比重增加(與2014至2017年相比，2018至2023年上半年分別上升6.9及7.9個百分點)、對中國大陸比重則下降(9.8個百分點)，反映出台廠全球布局地點的消長。

2.國人對外直接投資淨匯出款中，對OBU的比重最大，2018至2023年上半年的比重達49.3%。主因：

一我國企業多以其集團之免稅天堂註冊公司名義對第三地投資，並利用OBU帳戶具資料隱密、合法節稅、資金靈活調度及業務操作便利之優勢進行資金調度。

國人透過DBU對外直接投資淨匯出之主要地區比重



註：國人包括企業與個人。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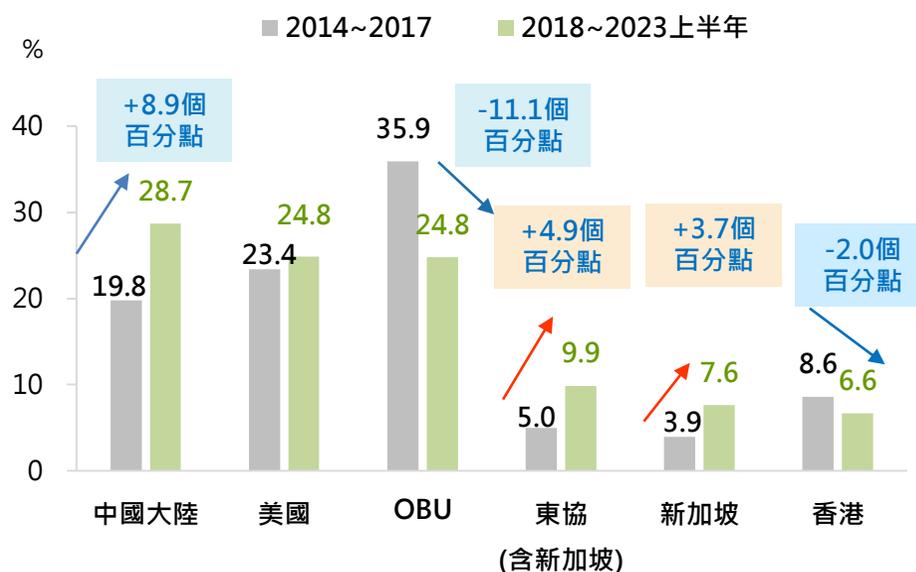
(二)隨台廠擴大東協產能，國人對東協與新加坡之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增加

1.近年國人對東協的三角貿易貨款匯出款比重增加(與2014至2017年相比，2018至2023年上半年上升4.9個百分點)，主因近年新興科技應用及疫情推升全球資通與視聽產品的需求，且東協係我國資通與視聽產品外銷廠商的主要生產基地之一*。

(1)隨台廠擴大在東協產能，增加「台灣接单、東協生產、外銷美國」三角貿易營運，致對東協的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上升。

(2)其中，國人對新加坡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上升(與2014至2017年相比，2018至2023年上半年上升3.7個百分點)：反映新加坡的地緣優勢，在全球供應鏈擴大布局東協及南亞之際，亦擴大新加坡國際營運及金融中心的經濟腹地。

國人透過DBU匯出三角貿易貨款之主要地區比重

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* 2022年我國資通與視聽產品外銷接单在東協生產比重5%。

2.近年雖我國廠商減少對中國大陸產能布局，但國人對中國大陸的三角貿易匯出款比重居高且仍增加。主因：

- (1)中國大陸仍係我國最大的海外投資地，以及資通與視聽產品外銷廠商的最主要生產基地*。
- (2)國人透過OBU及香港支付三角貿易貨款，可能有部分改由DBU直接匯至中國大陸：DBU與中國大陸外匯業務已持續放寬並可直接通匯，過去間接透過集團企業設立於低稅負地區轉單公司之OBU帳戶或經由香港匯出貨款的需求降低。此外，國際反避稅趨勢**下，部分企業簡化集團組織及金流架構，減少透過OBU帳戶匯付。

3.國人對其他東協國家(不含新加坡)的三角貿易匯出款量能尚低。主因：

- (1)隨東協及南亞國家成為台廠供應鏈多元布局之重點區域，集團企業對該地區的資金往來金額亦緩增，惟比重尚低；將待新建廠房完成及量產後，國人對其三角貿易匯出款才有望增加。
- (2)另部分廠商基於法務及稅賦等成本考量，其營運模式轉變為當地接單並生產，相關資金周轉部分直接在當地進行(如我國銀行在東協國家分支機構)，或轉往新加坡調度，未來與DBU的金流變化有待觀察。

* 2022年我國資通與視聽產品外銷接單在中國大陸生產比重達72%。

** 近年在國際反避稅趨勢下，部分企業因應移轉訂價(Transfer Pricing)查核及受控外國公司(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, CFC)稅制等租稅議題，精簡集團組織，簡化金流架構及相關成本，逐漸減少透過OBU帳戶匯付，改採直接由DBU匯款的模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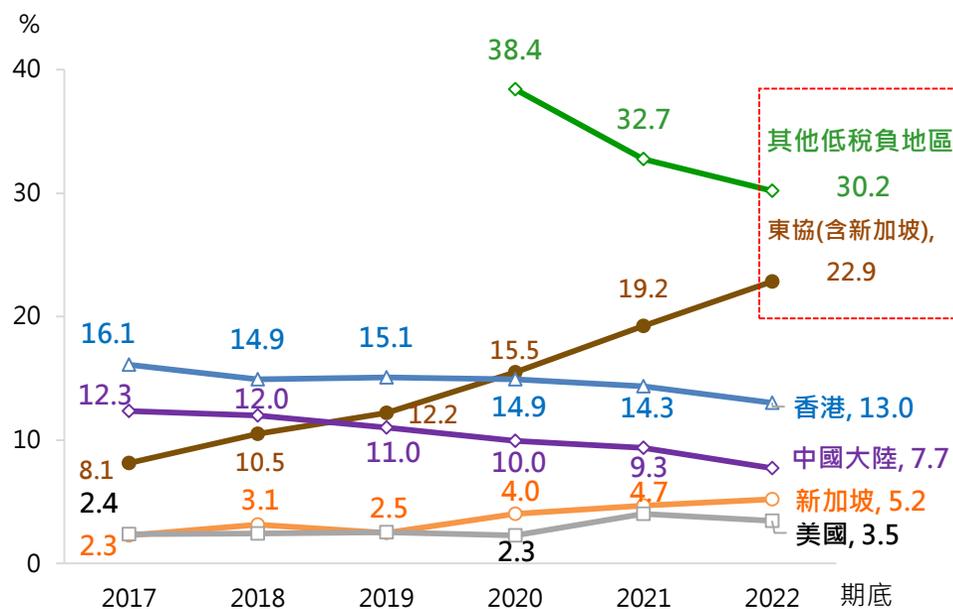
五、隨台商擴大東協布局，我國銀行與東協國家之資金往來更密切

(一)隨台商增加在東協布局，國內銀行對東協地區客戶的放款及存款比重均明顯成長，反映其提供資金協助台商海外投資營運

1.國內銀行(含DBU及OBU)對東協地區客戶(主要為布局東協之台商)放款比重由2017年底的8.1%大增至2022年底的22.9%，反映國內銀行提供資金協助台商海外投資營運。

一惟國內銀行對其他低稅負地區廠商放款大幅減少，可能與海外台商註冊地挪移有關。

國內銀行對境外主要地區客戶之放款比重變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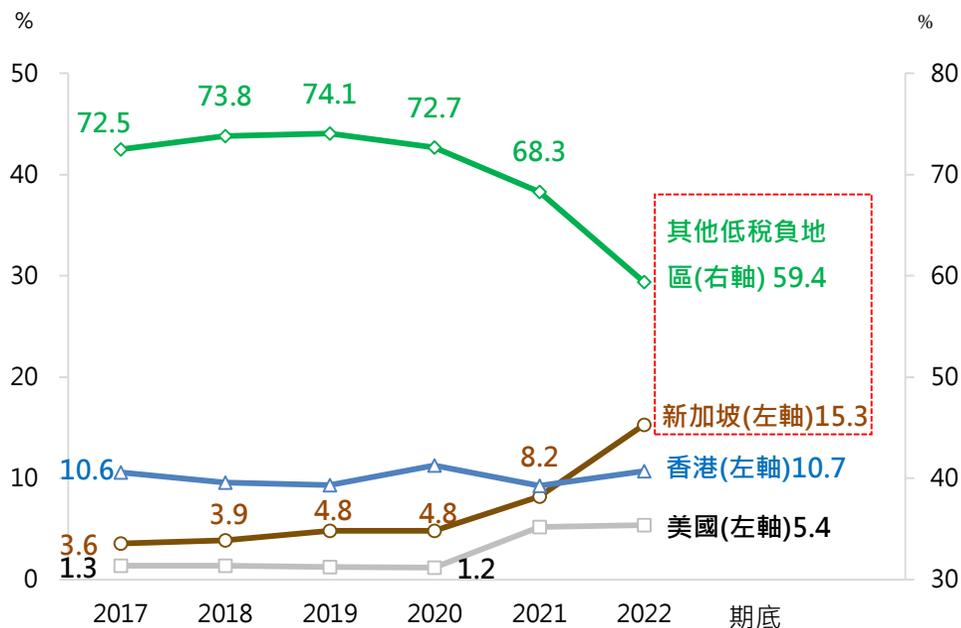
註：國內銀行包含DBU及OBU(不含海外分行)。資料來源：BIS

2.隨海外台商將註冊地向新加坡挪移，OBU來自新加坡客戶存款的比重由2017年底的3.6%增至2022年底的15.3%，同期間，來自其他低稅負地區客戶的存款比重則由72.5%降至59.4%。

—OBU帳戶多為我國企業境外註冊之子公司或境外關係企業所開立。海外台商將註冊地向新加坡挪移的可能原因：

- (1)受到近年免稅天堂施行實質經濟法案影響。
- (2)因應產業供應鏈調整契機，尤其新加坡政府祭出多項投資及租稅優惠措施。
- (3)反送中事件可能降低香港對台商的吸引力。

OBU境外客戶存款占比變化

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(二)本國銀行隨台商增加東協分支機構據點，擴大經濟腹地，提高營運量能與獲利

1.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扮演之功能：

- (1)在國際金融中心設立據點，參與國際金融市場，如紐約、倫敦、新加坡、香港。
- (2)配合台商或國人跨境移動就近提供更多服務，如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東協(含新加坡)。

—2013年10月我國政府宣示推動亞洲盃，並鬆綁多項金融法規後，本國銀行加快海外布局，初期以布局中國大陸最積極。

—近年東協國家經濟蓬勃發展、2016年我國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，及2018年起美中貿易爭端，致全球供應鏈逐漸移轉至具豐富天然資源及人口紅利的東協國家，本國銀行布局重點轉向新南向國家*，尤其是東協。

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之主要分布據點



* 新南向 18 國：東協 10 國(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印尼、越南、汶萊、寮國、緬甸、柬埔寨)、南亞6國(印度、斯里蘭卡、尼泊爾、孟加拉、不丹、巴基斯坦)、澳洲及紐西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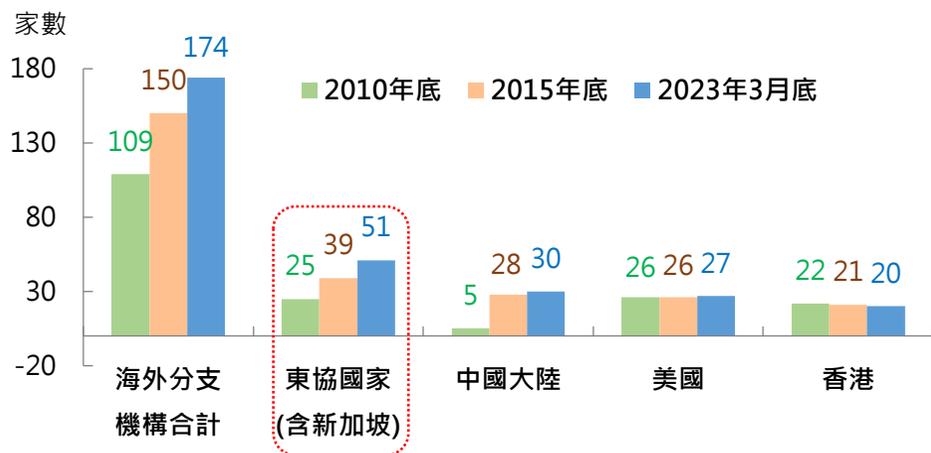
2.本國銀行積極擴增海外據點，東協國家為近年海外布局之重點地區

(1)2023年3月底，本國銀行共設立174家海外分支機構，以東協(51家)最多，較2015年增加12家；其次為中國大陸(30家)、美國(27家)及香港(20家)。

(2)東協國家分支機構之資產規模亦快速成長，2023年3月底達1.55兆元，較2015年成長1.35倍；僅次於香港分支機構之1.81兆元，已高於中國大陸分支機構之1.15兆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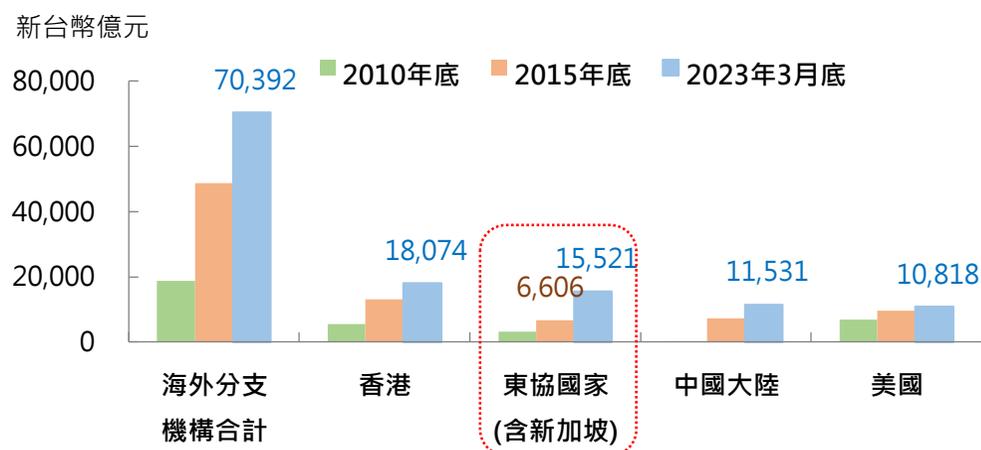
一東協國家中，以新加坡分行之資產規模最大且成長最明顯，2023年3月底達7,299億元，主要係新加坡作為亞洲金融中心，近兩年在美國大幅升息下，新加坡美元存款利率較高且稅負較低，吸引台商資金大量移入。

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分布前4大地區



註：海外分支機構包括海外分行及子行。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本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前4大地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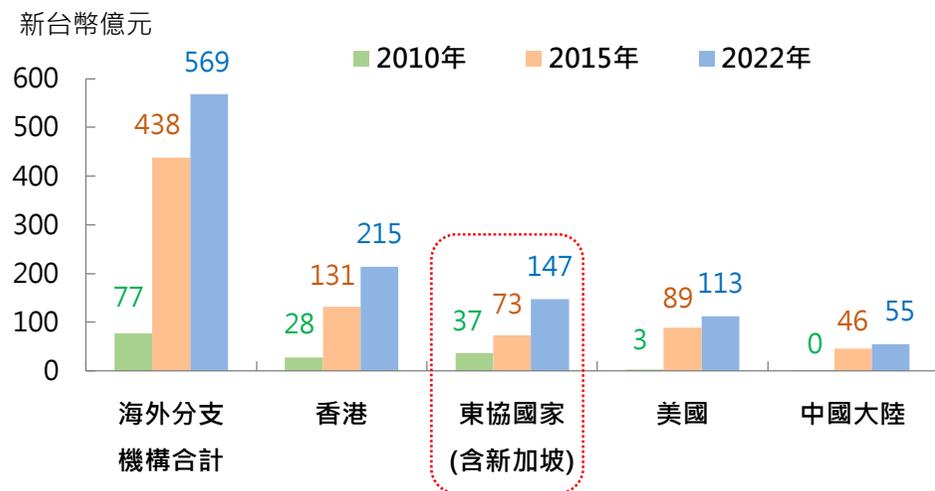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3.隨據點及業務擴增，東協國家分支機構之獲利明顯擴大

(1)2022年東協國家分支機構獲利達147億元之歷史新高，占海外獲利之25.8%，僅次於香港(215億元)，為本國銀行海外獲利之重要來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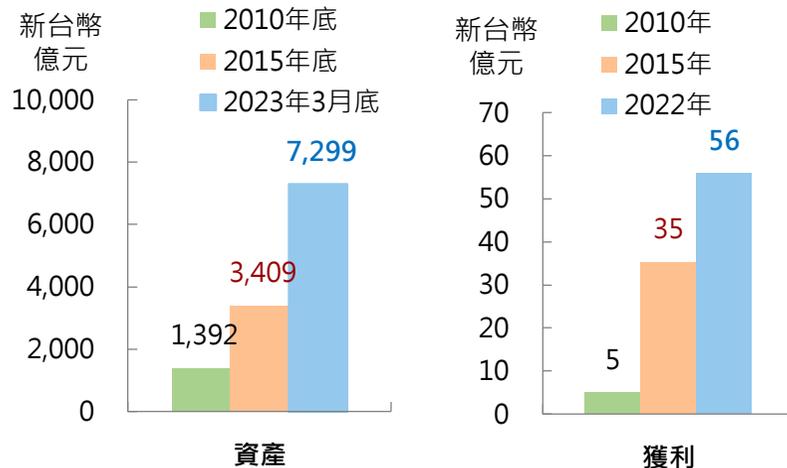
一東協國家中，近兩年新加坡分行獲利大幅成長，2022年獲利創56億元之歷史新高，占海外獲利之9.8%，除因呆帳費用減少外，主要受惠於利差擴大致利息淨收益增加。

海外分支機構獲利前4大地區

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新加坡分行資產及獲利

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(2)東協國家分支機構之資產規模及獲利均已超過中國大陸分支機構，僅次於香港，反映本國銀行跟隨台商轉進東協布局，提高整體營運量能與獲利。

六、結語

全球化發展為全球經濟帶來全球所得增加、貧窮率下跌、通膨走緩等總體面經濟效益，卻也衍生許多國家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惡化、階級對立等個體面問題爭議，形成抵制全球化的聲浪，催化民粹主義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，進而促使英國民眾公投決定脫離歐盟、美中貿易爭端不休，加以接踵而至的COVID-19疫情、俄烏戰爭，讓全球化發展更加複雜，這也讓全球經濟前景跟著國際政經情勢充滿不確定性。

面對近年美中衝突，全球化發展新變局，我國企業藉由產線重新布局(relocation)至東協國家等海外據點，不僅使對外直接投資與商品貿易等物流發生變化，亦帶動廠商對外直接投資與三角貿易跨境資金地區別流向出現變化；而隨台廠供應鏈的多元分流布局，一方面，擴大了台灣的經濟腹地，另一方面，也降低過去高度集中在中國大陸投資生產的現象。

就金融業而言，台灣不同於香港及新加坡等金融中心，均有明確的經濟腹地(分別為中國大陸、東協)，支撐其金融服務業朝集中式中心發展。長期以來，台灣的經濟發展係以台灣廠商在國內或全球布局為主，經濟腹地較為分散。而隨台商擴大東協布局，我國銀行與東協國家資金往來更密切，等同擴大金融服務業的經濟腹地，提供其發展的新契機。

台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，與全球經濟整合的程度甚深，過去積極參與全球貿易更協助我國躍升為高所得國家；近年全球化發展步調調整，對於台灣經濟前景具有重大意涵，須密切注意其發展。

以下就「全球化議題的省思」、「全球化變局下企業的機會與挑戰」，以及「全球經貿新變局下宜持續關注的金融經濟議題」提出看法，供各位先進參考。



全球化議題的省思

(一) 主流經濟學觀點偏重全球化帶來互利互惠的總體面經濟效益，卻忽略全球化有贏家、亦有輸家的個體面分配不均問題，亦忽略全球化恐限縮國家政策空間，可能引發政經不穩定。全球化宜為有限度、有智慧的全球化；為避免形成超全球化並緩和全球化造成之外部性和逐底競爭問題，主要經濟體宜透過國際政策協調來制定全球化之基本規範。

1. 過去諸多學者提倡全球化之美好，誠然，在全球化快速發展下，透過全球貿易、資本及勞動力自由移動，提升經濟效率，把經濟大餅做大，讓數億人口脫貧，更協助台灣、南韓等躍升為高所得國家。

然而，伴隨全球化，也帶來中低階技術勞工工作機會流失、貧富差距擴大等負面影響，這在先進國家尤為明顯；因此，並非所有人都支持全球化。

美國由於製造業就業機會流失、對中貿易逆差擴大及貧富不均擴大等問題，歐巴馬總統力倡製造業回流美國，川普更採行具保護主義色彩措施，引發美中貿易衝突。

中國大陸為避免民營陸企(尤其是科技巨擘)在全球化發展中日漸壯大，強化產業監管外，並強調「反壟斷」、促進「共同富裕」，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整治等。

此外，1997~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、2008年之後的全球金融危機及歐債危機等事件，也反映**全球化(資本自由移動)**可能加劇金融經濟波動，且透過全球金融連結蔓延至其他國家，**帶來廣泛的金融經濟不穩定**。另一方面，近期COVID-19疫情在全球擴散，亦與**全球化(人員跨境流動)**有關。

2.超全球化帶來諸多問題*：

- (1)帶來氣候變遷等**重大外部性**(major externalities)。
- (2)形成**逐底競爭**(race-to-the bottom)。逐底競爭係指各國政府為吸引外資，常競相降低稅率、工資、勞動條件、環境保護標準，以減輕投資者的經濟負擔、極大化商業利潤。如此會**侵蝕既有勞動市場和金融市場之規範**，並**損害公司治理和社會福利**。
- (3)超全球化將**直接減少一國國內政策空間**，並提高該國政府**因應全球化及處理國內議題之難度**，影響該國政經穩定。
- (4)許多國家雖瞭解全球化過度發展的問題，並嘗試調整相關政策，惟仍無法解決既有矛盾，衝突仍難避免；尤其**COVID-19疫情、俄烏戰爭**，更使**全球化的問題複雜化**，導致全球局勢愈趨分裂，從而**引發對新冷戰 (new Cold War) 的擔憂**。

為避免形成超全球化並緩和全球化造成之外部性和逐底競爭問題，主要經濟體宜透過國際政策協調來制定全球化之基本規範。

資料來源：Palley, Thomas I. (2017), "The Fallacy of the Globalization Trilemma: Refram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emocracy," *FMM Working Paper*, No. 08.



(二)在地緣政治風險及**全球供應鏈重組**變局下，為我國**企業帶來新發展機會**，其以**投資與貿易地區分流**因應，不但提升台灣的生產韌性，**並使台灣的經貿發展更趨平衡**；惟**企業也面臨諸多挑戰**。企業亟需**妥適應變**，並**搭配政府政策的支持與協助**，讓台灣繼續保持競爭優勢，**確立不可取代的地位**。

1.全球化變局下，為企業帶來新發展機會

- (1)面對美中衝突，我國企業藉由**產線重新布局**至海外多元據點(如東協、美歐等)，**爭取新訂單、提高生產韌性、廣納人才**等，最終提升以台灣為總部的**國際競爭力**。
- (2)我國企業透過**分散投資與貿易地區**因應，**擴大台灣物流與金流的經濟腹地**，**降低過去高度集中於中國大陸投資生產**的現象，使台灣的經貿發展更趨平衡(balance)。

2.全球化變局下，企業也面臨諸多挑戰，亟需妥適應變

- (1)企業因應地緣政治風險而採多元化布局，面臨**建廠成本及管理難度上升**，以及**各國稅務法規調適**等挑戰。
- (2)美中科技對抗持續，除**影響供應鏈生產效率**，造成企業成本上升外，企業亦面臨**各國愈來愈多管制措施**的不確定性，與**經營競爭環境改變**。

3.政府政策支持與協助，有助企業克服挑戰

- (1) **積極與各國洽簽貿易協定**：政府已與美國展開「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」、建立「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」及簽署「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」首批協定，並積極推動加入「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」(CPTPP)，促進與盟國產業合作及達成關鍵供應鏈多元化目標。
- (2) **協助企業爭取海外資源**：目前台灣高科技產業仍為各國極力爭取投資及合作對象，政府宜協助企業掌握各國投資優惠與規範，爭取及整合當地資源。
- (3) **協助企業因應各國最新管制措施**：美國及其盟國與中國大陸不斷推出新管制措施，政府宜迅速蒐集資訊並對可能的新管制措施及早研究，協助企業克服相關衝擊。



(三) **金融業**順應供應鏈重組及多元布局，**擴大經濟腹地規模**，並協助台商籌資，**增進金融服務量能**。

不同於香港及新加坡等金融中心，均有**明確的經濟腹地**(分別為中國大陸、東協)，支撐其金融服務業朝**集中式中心**發展；長期以來，台灣的經濟發展係以台灣廠商在**國內或全球布局**為主，**經濟腹地較為分散**。

因此，在因應當前全球政經情勢轉變及**產業供應鏈全球重新布局契機**，我國金融面的因應：

1. **積極引導台商資金及外資投資進行國內實質投資**，**擴大金融業的國內業務量能**：此除可帶動國內生產力及薪資提升，促進就業及經濟成長外，亦可**擴大支撐金融業業務能量**。

2.提升金融業的國際化程度，擴大海外業務量能：金融業可配合廠商布局調整及新南向政策，將金融服務帶往各國，擴大經濟腹地；透過DBU與OBU相輔相成，發展為台商貿易結算及資金調度中心。

- (1)隨著美中衝突、台商產能重新布局及強化新南向政策，銀行業加強海外布局(即透過物流的改變，引導金流改變)，挹注必要的資金與增加金融服務能量，並藉由母行充沛的資金與國外分支機構相互支援，提高本國銀行業整體獲利。
- (2)掌握全球製造業移轉趨勢，強化與東協、美歐等投資熱點間之金融跨境合作，協助客戶因應全球新變局。
- (3)台灣有充裕的外幣資金及新台幣流動性，國內DBU之外幣資金移動規模龐大且靈活自由，OBU可與之相輔相成，並提高金融競爭力*，發展台灣成為台商貿易結算及資金調度中心。

3.新台幣匯率穩定是金融正常運作之基石，對國內製造業營運至關重要，對金融業穩定發展，亦屬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。以亞洲金融中心的香港及新加坡為例，兩者皆採行維持本幣穩定之匯率制度。

*例如，加強培育國際金融人才與商品開發能力，並強化雙語教育與調適法規，接軌國際市場及提高金融競爭力；善用台灣5G、AI等技術運用及國際大廠(如Google、Amazon等)在台擴大資料中心營運及研發的契機，發展Fintech與數位金融轉型，使金融業務加速數位化。

(四)美中爭端使台灣對美國貿易順差擴大，宜持續關注其發展，並避免成為美國貿易制裁對象。

1.2018年以前，台灣對美國商品及服務貿易順差均未逾150億美元之美國匯率政策報告檢視標準。

2.美中爭端後，美國自台灣進口資通訊與視聽產品大增，致2019年起，台灣對美國商品及服務貿易順差均超過美方檢視標準。

—2018年起，美中貿易及科技爭端，以及美國強化資安防護，改自中國大陸以外國家進口網路通訊產品的轉單效應。

—COVID-19疫情使零接觸相關的科技產品需求劇增。

⇒非匯率因素造成美國對台灣商品貿易入超擴增(第9頁右圖)。

台灣對美國貿易順差(億美元)

西元年	2018	2019	2022
商品貿易出超	152	230	475
商品及服務貿易順差	120	193	510

資料來源：美國商務部

3.為避免引發台美貿易紛爭，並兼顧國內金融穩定，本行除維持新台幣匯率動態穩定，並持續與美國財政部在良好的互動基礎上，就該部關心議題進行溝通。

4.全球供應鏈已由過去效率優先的「成本導向」，轉變為信賴優先的「安全及韌性導向」，在台灣致力成為盟國可信賴夥伴之際，宜持續關注台美貿易失衡情勢，避免因此損及友好夥伴關係，成為美國貿易制裁對象。



感謝聆聽
敬祝大家
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！
謝謝！

部分圖片、圖示取自<https://www.businessweekly.com.tw>、
<https://big5.ftchinese.com/interactive/87558?exclusive>、
<https://www.showeet.com>、<https://www.goldppt.com>等網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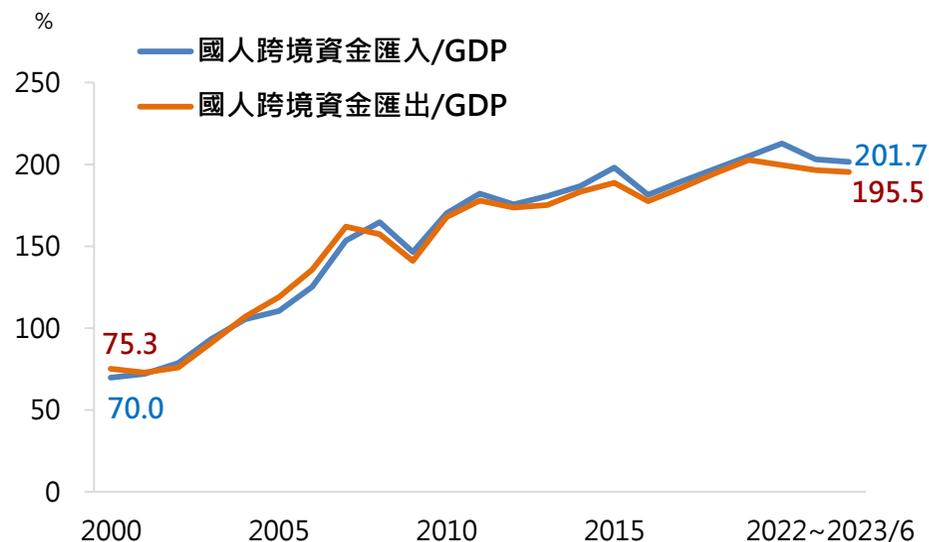
附錄 國內銀行(DBU與OBU)為我國企業跨境資金調度之重要據點

國內銀行具地利優勢，更瞭解我國企業於境內外營運所衍生出之營運資金管理、融資及成本風險等需求，故無論是DBU或OBU，在資金調度之便利性、營運資金之融通、匯兌風險管理等，均得以提供更貼切之金融服務，讓國內銀行為我國企業跨境資金調度之重要據點

1. 我國企業為掌握擴增供應鏈衍生之跨境資金進出，相關金流及調度仍集中在台灣總部。

—國人透過DBU跨境資金匯入及匯出對GDP比率呈上升趨勢，2022年至今，該比率分別為201.7%及195.5%。

國人透過DBU跨境資金進出對GDP比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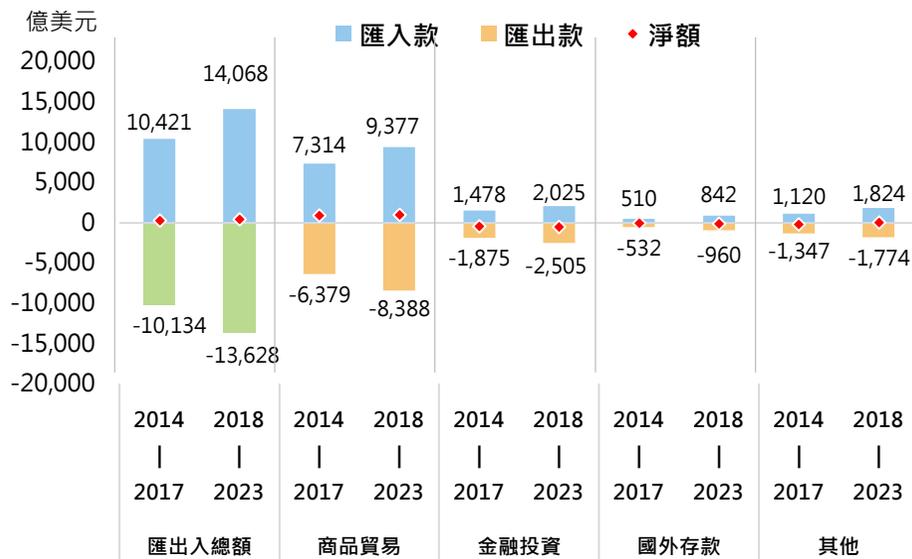
註：國人跨境資金包括商品及服務貿易、所得收支、對外直接投資、對外金融(證券)投資、國外存款及其他(如借款等)的匯出入款。國人包括企業與個人。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2. 商品貿易貨款為國人跨境資金進出最大項目，近年貨款進出的規模擴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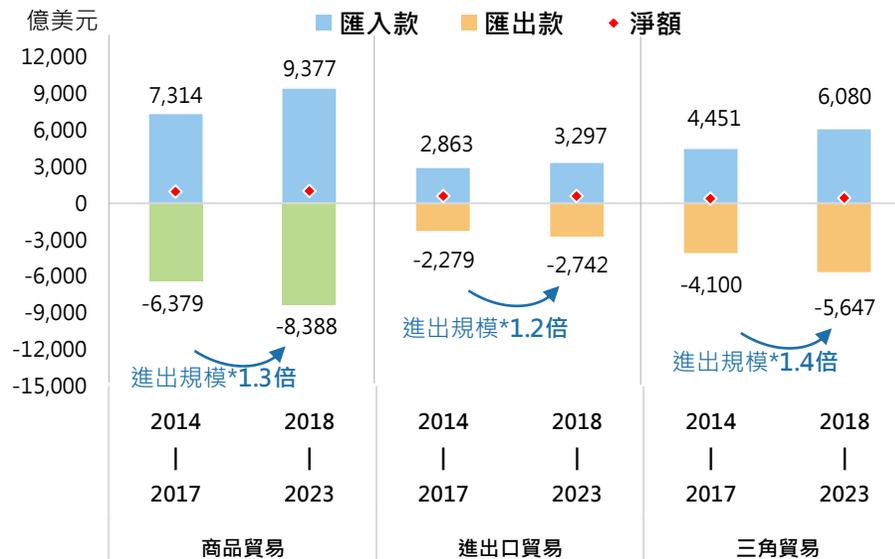
- (1) 商品貿易貨款占國人跨境資金進出比重達2/3，為近年國人跨境資金進出規模增加主因。
- (2) 新興科技應用增加及疫情宅經濟熱絡，推升全球電子及資通與視聽產品需求增加，帶動台灣進出口及三角貿易貨款進出規模擴增。

國人透過DBU之跨境資金進出
(2014~2017年 vs 2018~2023年之年平均)



註：2018~2023年之年平均係採2018至2023年上半年合計值除以5.5估算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國人透過DBU之商品貨款跨境進出
(2014~2017年 vs 2018~2023年之年平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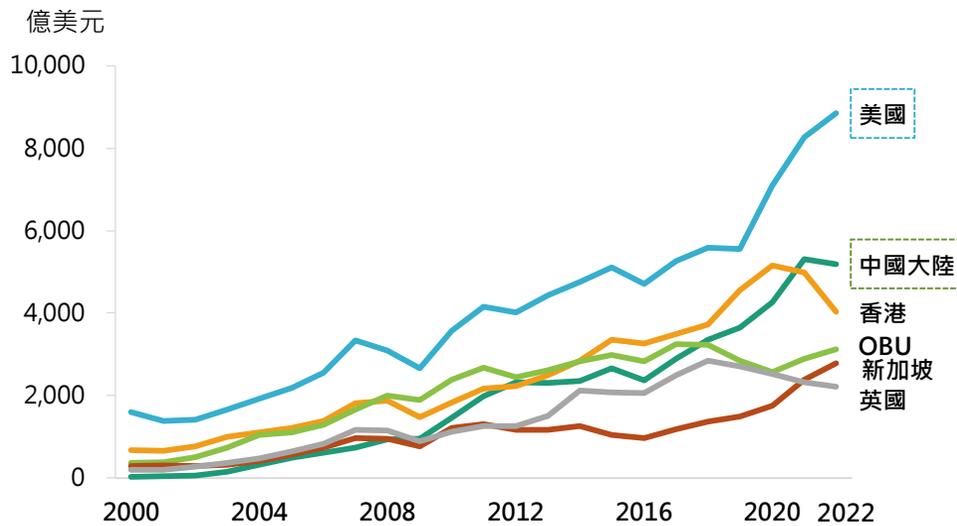


註：2018~2023年之年平均係採2018至2023年上半年合計值除以5.5估算；
商品貿易=進出口貿易+三角貿易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3. 兩岸資金往來以貨款收支為主，近年因直接通匯便利性提高，間接透過OBU匯款比重下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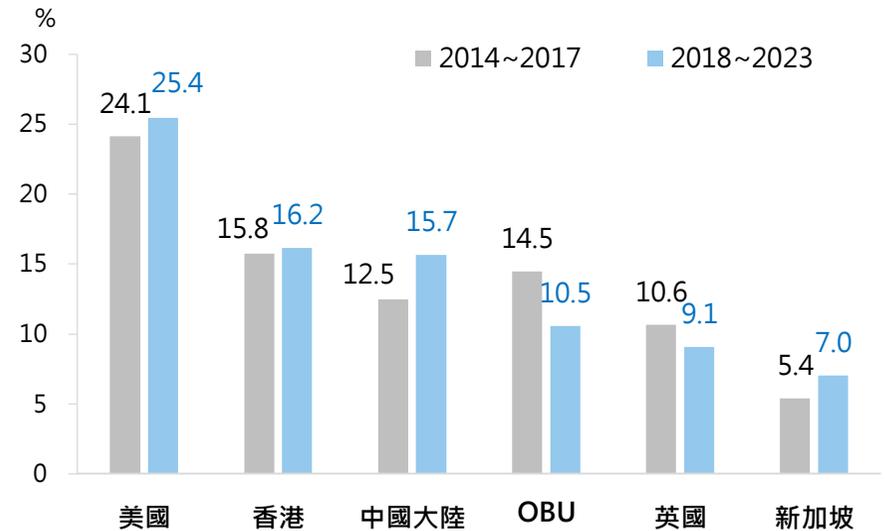
- (1) 國人與中國大陸及OBU間的資金往來以貨款收支為主，反映兩岸直接與間接金融往來為雙方經貿關係重要的一環。
- (2) 中國大陸雖為台灣最大對外直接投資地及貿易夥伴，惟過去中國大陸金融交易未完全開放，國人對中國大陸資金多間接透過OBU、香港等地匯款。
- (3) 近年國人對OBU及香港的貨款收支匯款未再明顯增加，主要係DBU與中國大陸外匯業務持續放寬與直接通匯之便利性提高；惟DBU客戶對香港金融投資的資金進出增加，故進出香港資金的比重仍略升。

國人透過DBU跨境資金進出之主要地區金額

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國人透過DBU跨境資金進出之主要地區比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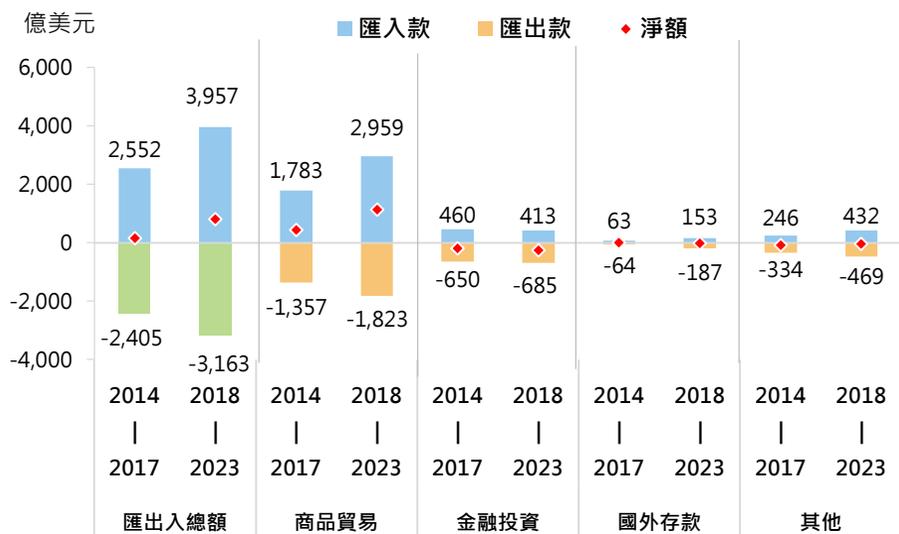


註：2018~2023年係採2018至2023年上半年合計值計算比重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4. 國人與美國跨境資金往來規模最大，近年商品貨款進出顯著擴增；相對地，國人自英國商品貨款收入則減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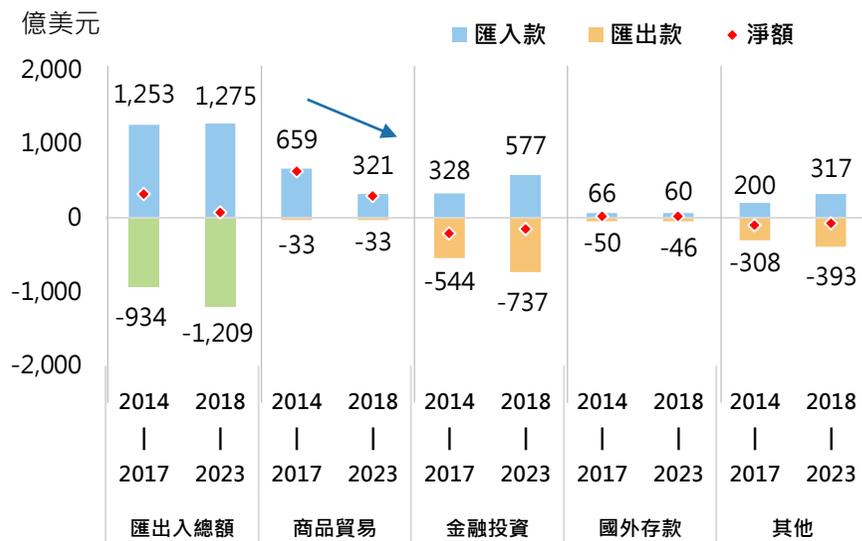
- (1)由於紐約及倫敦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國人對美國及英國間的金融資金往來相對密切。
- (2)美國為國人跨境資金往來規模最大的國家，除對美國金融投資外，近年台灣與美國商品貨款進出明顯擴大，反映美中爭端及疫情使得美國對台廠電子資通訊產品需求增加。
- (3)國人與英國跨國資金往來以對其金融投資為主；近年受美國稅改*影響，若干設於英國跨國企業回流美國，致台灣外銷訂單來源部分由英國改為美國，國人自英國三角貿易收入趨減。

國人透過DBU對美國跨境資金進出
(2014~2017年 vs 2018~2023年之年平均)



註：2018~2023年之年平均係採2018至2023年上半年合計值除以5.5估算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國人透過DBU對英國之跨境資金進出
(2014~2017年 vs 2018~2023年之年平均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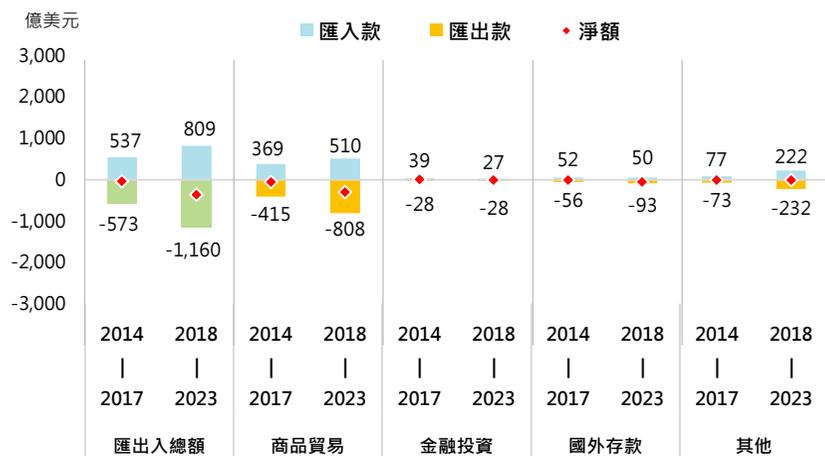
註：2018~2023年之年平均係採2018至2023年上半年合計值除以5.5估算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* 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簽署「減稅與促進就業法案」，自2018年開始，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由最高35%的累進稅制降至單一稅率21%。

5. 商品貿易為國人對新加坡及香港跨境資金收付主要項目，而企業對新加坡金融投資的資金進出不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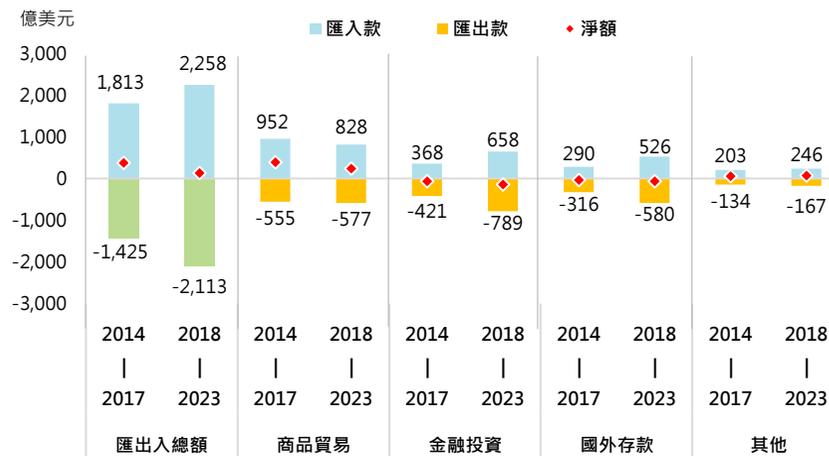
- (1) 國人對新加坡跨境資金呈淨匯出，主要係隨供應鏈轉進東協，對該區域貨款支出較大；而金融投資資金進出不多。此反映東協提供新加坡廣大的經濟腹地，係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因素。
- (2) 國人對香港跨境資金往來較密切，且呈淨匯入，雙方以商品貿易資金往來較大，此亦反映中國大陸提供香港廣大的經濟腹地。另因香港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及亞洲最大資產管理中心，為國人對外金融投資的重要管道之一。

國人透過DBU對新加坡跨境資金進出
(2014~2017年 vs 2018~2023年之年平均)



註：2018~2023年之年平均係採2018至2023年上半年合計值除以5.5估算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國人透過DBU對香港跨境資金進出
(2014~2017年 vs 2018~2023年之年平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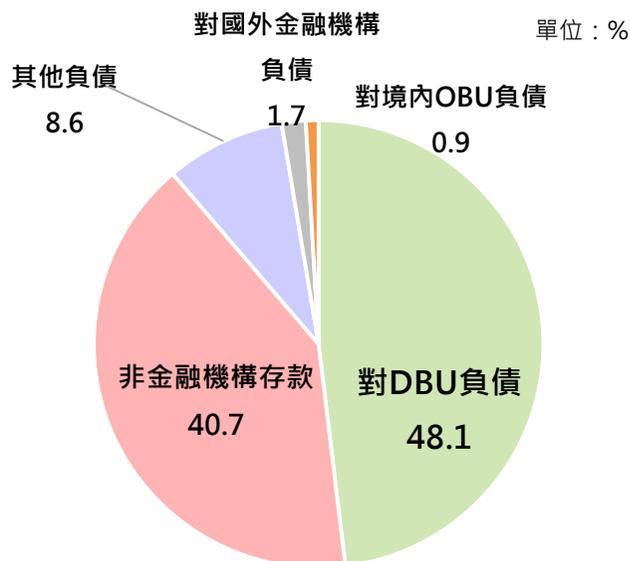


註：2018~2023年之年平均係採2018至2023年上半年合計值除以5.5估算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6. OBU提供海外台商充裕之外幣營運資金融通，凸顯OBU資金調度的角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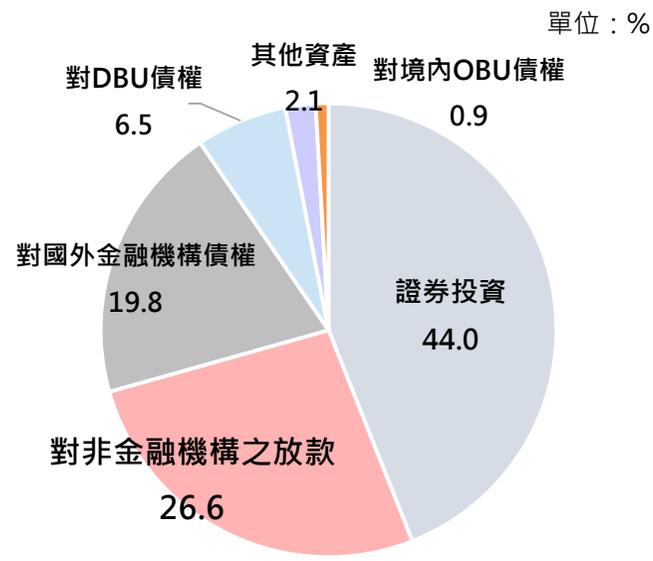
(1) OBU資金來源主要為DBU(左圖綠色區塊)及非金融機構客戶(即海外台商)存款的資金注入，資金運用去向主要為證券投資及對境外非金融機構(海外台商)之放款(右圖紅色區塊)，顯示DBU與OBU間之資金調度，有助於OBU提供海外台商充裕之外幣營運資金融通，凸顯OBU資金調度的角色。

OBU負債項目比重
(2023年5月底)



註：非金融機構即海外台商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OBU資產項目比重
(2023年5月底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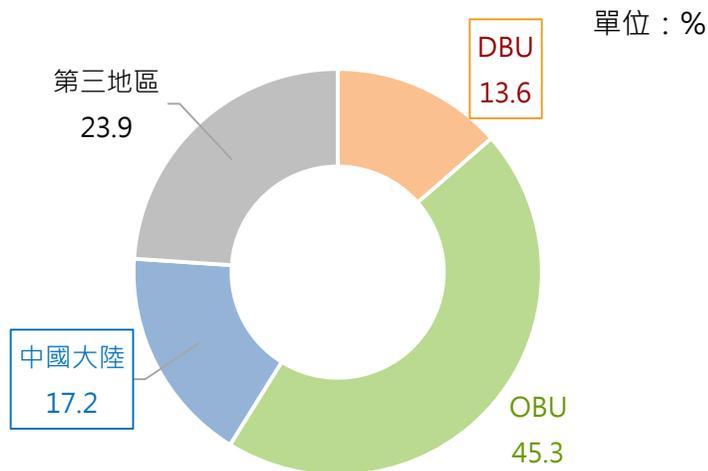


註：非金融機構即海外台商；因四捨五入關係，各細項加總未等於100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(2)海外台商在OBU資金調度主要為國際貿易之貨款收支，除OBU境外客戶間之資金調撥頻繁(占資金流出入總量45.3%)外，與中國大陸及DBU間的資金往來亦甚密切(分別占資金流出入總量17.2%、13.6%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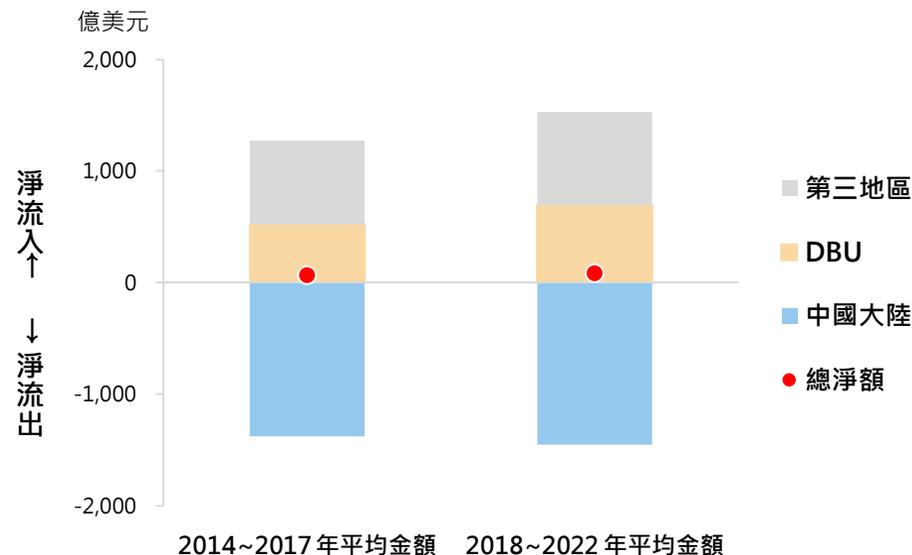
(3)OBU境外客戶資金淨流出去向主要為中國大陸，淨流入來源則為DBU及歐、美、香港等第三地區，反映我國企業透過OBU進行三角貿易*及「台灣接单、大陸生產」運作模式及資金調度情況，亦顯示DBU與OBU相輔相成。

OBU境外客戶資金流出入總量之地區別比重
(2022年)


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

OBU境外客戶之資金流出入淨額



註：第三地區係指歐、美、香港等。
資料來源：中央銀行